

元代的夷夏觀念潛流

張佳*

元明易代之際，由朱元璋部發布的〈諭中原檄〉，是中國近世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獻，其激越的夷夏觀念，曾是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重要源頭。然而根據現有研究，元代漢人缺乏族群意識自覺，甚至元明易代，或被視作是一場後人「想像」出來的族群革命。在這一研究脈絡下，〈諭中原檄〉遂為無源之水，成為一份突兀的思想史文本。

本文嘗試發掘史料，勾稽有元一代漢人族群意識由隱而復顯的歷史。雖然並非元代士人的主流話語，但夷夏觀念一直是元代思想界的潛流。面對北方的壓力，宋金季年都曾以儒家的夷夏理論，作為文化抵抗的工具，士人都曾籠罩於夷夏話語之下。入元之後，這類論調在文獻中驟然消退，但這並不表明士人思想隨著王朝易代即刻發生轉向，而是反映了元初政治壓力導致的遺民話語抑制。作為思想潛流，元人的夷夏觀不僅反映在文字上，也反映在行為上。堅持故國衣冠、不從北俗，或者身為元人而眷念宋朝，都是這一思想潛流的體現。元代表夷夏話語的文字表達，大多是隱性的，借助典故與比喻等修辭手法包裹起來，需要在特定語境中方可理解。直到元季，這股思想潛流再度凸現，成為元明易代的思想基調之一。〈諭中原檄〉即誕生於元末的夷夏語境當中，其遠源是宋人重新詮釋的《春秋》等儒學理論，近源則是元代漢人潛在的族群意識與各種夷夏論述。

關鍵詞：元代 夷夏觀念 族群意識 〈諭中原檄〉

*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

本文係貴州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國學單列課題（18GZGX32）支持成果。

一·引言：現有元代思想史脈絡下的突兀文本

吳元年（1367，元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部北伐發布的標舉「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的〈論中原檄〉，因其強烈的夷夏觀念（或曰「原始民族主義」，proto-nationalism）色彩以及其對清末民族革命的影響，而備受關注。然而，對於〈論中原檄〉的思想源流、及其賴以生成的社會與文化背景，尚未有充分的討論。無論從清修《明史》所著意凸顯的元末群雄起事背景，還是從現有的元代思想研究揭示的脈絡來觀察，〈論中原檄〉都是一份相當「突兀」的思想史文獻。《明史》將元末動盪歸因於宗教因素，無關乎族群矛盾；¹ 而元代思想文化史的諸多研究指出，儘管生活在蒙古與色目貴族的聯合統治之下，元代漢族士大夫的夷夏觀念淡薄，並沒有想像中的族群意識自覺，² 宋元之際生活在戰爭殺掠與族群壓迫之下的南方士

¹ 清修《明史》對元末戰亂歷史背景的曲諱，參看張佳，〈元明之際「夷夏」論說舉隅：兼說清代官修書籍對明初史事的隱沒與改纂〉，《中國典籍與文化》2013.4：42-49。

² 有關元代漢人族群意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元末，體現在對元明易代性質的認識上。二十世紀三〇年代，吳晗認為元明革命表現為「民族與民族的戰爭」，但起因是政治與經濟壓迫，到後期由於「民族意識的自覺」，才使革命口號「轉而側重於民族地位的歧視方面」，參吳晗，〈元帝國之崩潰與明之建國〉，北京市歷史學會主編，《吳晗史學論著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第2卷，頁81-138。蒙思明稍後的觀點與之類似，認為元末農民運動「雖不免有若干之民族矛盾，而民族矛盾之非革命之主因則可斷言」，見蒙思明，《元代社會階級制度》（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頁181。吳、蒙二氏之後，對這個問題有三篇重要的討論。宮崎市定認為，「元明革命中『攘夷』思想淡薄」，並非像辛亥革命那樣，「一開始就意識到這是一場民族革命」，參宮崎市定，〈從洪武到永樂——明朝初期政權的性質〉，張學鋒等譯，《宮崎市定亞洲史論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下冊，頁1061-1079。錢穆認為元末漢族士人夷夏觀念淡薄，對元明鼎革並無「華夏重光」的喜悅，見錢穆，〈讀明初開國諸臣詩文集〉、〈讀明初開國諸臣詩文集續篇〉，氏著，《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第6冊。劉浦江以上述研究為基礎，認為「元明鼎革的性質主要是由階級矛盾引起的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而並非像人們過去慣常理解的那樣是一場民族革命」，著重考察了從明朝中葉到晚清時代，元明易代在何種背景下被「想像」成民族革命、朱元璋如何被塑造成民族英雄，參劉浦江，〈元明革命的民族主義想象〉，《中國史研究》2014.3：79-100。不過，也有學者不完全贊同上述結論。蕭啟慶認為錢穆「元季漢族儒士並無強烈的夷夏之辨思想，而且對元朝並無惡感」的說法「並不全面」，認為「元朝的族群關係甚為緊張」，到元末群雄起事時「民族主義更成為唯一號召」，見蕭啟慶，〈內北國而外中國：元朝的族群政策與族群關係〉，氏著，《元朝史新論》（臺北：允晨文化，1999），頁58-59。不過，對元代漢族士人的族群意識，蕭先生未有詳細的專門研究。筆者同意「華夷之辨」並非元代漢族士人的思想主流，但對宮崎市定、劉浦江諸先生關於元明易代「族群革命」色彩薄弱的論斷，並不贊同；而且從後文分析的「復宋」口號來看，元末民變自始便帶有族群色彩，並非如吳晗所稱「最

人，似乎也並未表現出特別的抵抗意識。³ 如果從上述研究脈絡觀察，〈論中原檄〉強烈的華夷觀念便成為無源之水，宛如憑空而起的平地驚雷，無從追溯其得以生成的思想淵源和歷史語境。

將蒙元視作異族他者（也即明人常稱的「胡元」），是否為明初才突然迸發的一種觀念？筆者近年閱讀元代史料發現，雖然稱頌蒙古統治者主導的「大一統」是元代士人的主流話語，然而作為宋代思想基調的「華夷之辨」、「夷夏之防」，⁴ 入元後無論在士人當中還是在民間，都有餘音遺響，只不過淪為被遮掩與抑制的思想潛流。從元初到元季，漢族士人的夷夏觀念經歷了從蟄伏到甦醒的過程，最終成為朱明得以取代蒙元的重要思想資源。本文嘗試勾稽各類史料，梳理和討論元代夷夏觀念從潛伏到凸顯的歷史過程。

二·宋、金季年的夷夏論述

遼夏金蒙四個北族政權次第興起、與中原王朝鼎足而立，是九至十三世紀所呈現的基本國際格局，以致有學者將這一時段，稱作中國歷史上的第二次「南北朝」。⁵ 兩宋立國，都面臨北方強鄰的巨大威脅；而南宋更長期以卑辱的姿態，生

後才一轉而喊出民族革命的口號」。後文將要指出，元明易代族群革命色彩薄弱這一結論的得出，一定程度上歸因於史料檢讀的疏漏、元代的文字抑制以及清人改竄史料的誤導。

又，「族群意識」（或曰「民族意識」），是一個在中文語境中使用頗早的概念。民國初年梁啟超即稱，「何謂民族意識？謂對他而自覺為我」，參梁啟超，〈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氏著，《梁任公近著·第一輯》（上海：商務印書館，1926），下卷，頁44。費孝通稱，「（人們共同體）必須和『非我族類』的外人接觸才發生民族的認同，也就是民族意識」，見費孝通，〈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北京大學學報》1989.4：1-19。筆者同意馬戎的概括，認為「族群意識」的本質，是人們對自身所屬族群的認同，和對其他族群的認異。族群意識在後天環境中萌生、明晰並不斷變化，其強弱程度受族群內部需求及外部環境的影響。較為強烈的族群意識，往往對其他族群存在排斥態度，表現為種族、文化的優越感，和希望保持本族群對資源的控制。可參馬戎，〈試論「族群」意識〉，《西北民族研究》2003.3：5-17；羅瑛，〈族群相關概念及理論維度綜述〉，《西北民族大學學報》2016.5：34-39。

³ 陳得芝，〈論宋元之際江南士人的思想和政治動向〉，《南京大學學報》1997.2：151。

⁴ 參看葛兆光，《中國思想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第2卷，頁266-269；葛兆光，〈宋代「中國」意識的凸顯——關於近世民族主義思想的一個遠源〉，《文史哲》2004.1：5-12。

⁵ 參看李治安，〈兩個南北朝與中古以來的歷史發展線索〉，《文史哲》2009.6：5-19。

活在北方游牧政權的陰影之下。在強敵環伺的國際環境下，強化內部認同、凝聚民心一致對外，成為宋代的緊迫問題；⁶ 而亡國之憂屢次迫在眉睫的南宋，對此則更為關切。傳統儒學當中強調胡漢有別、應當各安其分的夷夏理論，恰為建立內部認同、劃定彼我界限，提供了理論工具，故此受到南宋政府與士大夫的格外關注。宋元之際的戴表元（1244-1310），回憶其早年在南宋太學受到的教育說：

咸淳（1265-1274）中，余備員太學。博士弟子見學官月講必以《春秋》，竊怪而問諸人。曰：「是自渡江以來，為復仇之書，不敢廢也。」夫復仇之說，非《春秋》本旨。中興初，胡康侯（按胡安國，1074-1138）諸公，痛數千年聖經遭王臨川禁錮，乘其新敗洗雪而彰明之，使亂臣賊子者增懼，使用夏變夷者加勸。⁷

《春秋》是後儒闡發夷夏理論最為倚重的經典。牟潤孫先生已經指出，南宋初年學者基於時政的需要，對《春秋》進行了新的詮釋；以胡安國《春秋傳》為代表，《春秋》學的闡釋重心，由北宋時代的「尊王」，轉移到了「攘夷」。⁸ 胡傳不僅是南宋科舉必讀書，而且根據戴表元的回憶，還是南渡以來太學月講的必講題目，原因即在於其高舉的「攘夷」、「復仇」旗號，緊密契合了南宋時代的政治需求。不僅在經書講義當中，這類號召排外的夷夏宣傳，在一般的士人讀物裡也有很多體現。南宋人歐陽起鳴（嘉熙二年 [1238] 進士），曾經編纂過多種科舉讀物。他的《歐陽論範》，是一部教導士人寫作策論的教材，頗可以反映南宋後期國勢日蹙情勢下的思想氛圍。《歐陽論範》開卷首篇即為〈帝王以全取勝〉，申說漢人趙充國抵禦羌戎的經驗，主張先保全自身而後再伺機而動，講述的是禦夷軍事策略；⁹ 第二篇論題為〈中國帝王所自立〉，意圖論證南宋立國的文化合法性，並回答當時面臨的現實問題：南宋喪失了中原，是否還為「中國」？其論述策略，對「中國」進行文化與種族的雙重定義，強調只有得「古今正統之傳」、有「衣冠禮樂」者方為中國，夷狄（諸如五胡）即使「嘗腥吾中原」、佔據了地理意義的「中國」，也終為「異

⁶ 參看前揭葛兆光，〈宋代「中國」意識的凸顯〉，頁 5-12。

⁷ 戴表元，《剡源戴先生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第 228 冊，上海：上海書店，1989，據明萬曆刊本影印），卷七，〈春秋法度編序〉，頁 1a。

⁸ 牟潤孫，〈兩宋春秋學之主流〉，氏著，《注史齋叢稿》（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 155-161。

⁹ 歐陽起鳴，《歐陽論範》（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23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據明刊本影印），卷一，頁 37-38。該論題與南宋內部是否要趁蒙古亡金收復中原的爭論，有直接的關聯。

類」，不能視為正統。¹⁰ 這個論題，反映了南宋士人對偏安可能造成文化正統喪失的焦慮——其實也正如作者所擔心的，佔據中原的金人（以及後來的蒙古），正是借助地理優勢與南宋進行正統競逐，¹¹ 鄙稱南宋為「淮夷」、「島夷」。¹² 面對淪陷的故土，作者一再強調中原是華夏立足之地，「中國者，中國之中國也」，夷狄必然會重蹈「忽強而遽弱，方盛而復衰」的歷史覆轍，不能與華夏並立。¹³ 這兩篇策論雖然都由歷史典故引出，實際卻是對南宋軍事與文化處境的回應。作為科舉範文，它們既體現了南宋政府的文化導向，也反映了南方士人的思想關切。

宋金對峙時期，南宋通過夷夏理論貶抑金人，已經為人熟知。然而出於後文將要論述的原因，宋蒙對峙時期南宋的夷夏宣傳，卻相對少見。其實在南宋人眼中，蒙古和女真並無二致，夷夏理論依然是南宋進行文化抵抗的工具。這在今天能見到的、未經改竄的宋末史料中依然可以看到。咸淳十年（1274）元軍大舉南下，危急時刻南宋朝廷下詔抵抗，稱：「憤茲醜虜，闖我長江……古未有純是夷虜之世，今何至泯然天地之經」，號召各地「體上天福華之意，起諸路勤王之師」。¹⁴ 按照宋人的觀念，華夷並立正如陰陽並生，¹⁵ 從未有過「純是夷虜之世」，他們從歷史經驗推斷危機依然有緩解的餘地。景炎元年（1276），南宋流亡朝廷下詔褒揚文天祥「適裔虜之猗夏，率義旅以勤王」，任命文氏為丞相，協助朝廷修政「攘夷」。¹⁶ 在這些詔書裡，蒙元攻宋即被視為「蠻夷猗夏」。太學生區仕衡（1217-1277）在家鄉順德起兵，檄稱「氈裘之眾雖悍，然舟楫非其鑿戰所便……夷氛縱惡，宋運未

¹⁰ 歐陽起鳴，《歐陽論範》卷一，頁38-39。

¹¹ 關於金人「中原即中國」的觀念，參看趙永春，〈試論金人的「中國觀」〉，《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9.4：1-12。蒙元初期的金源遺士，依然保持這一觀念。

¹² 這是金人貶抑南宋常用的修辭，如趙秉文〈宣宗哀冊〉描述金朝對宋蒙南北兩面的戰爭，云「降虜孝順而革心，島夷畏威而獻馘」，〈平章授左副元帥謝表〉：「王氣已吞於吳會，而天誅未即於淮夷」，分見趙秉文，《聞聞老人滏水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第219冊，據汲古閣鈔本影印），卷一〇，頁14a；卷一八，頁5a。

¹³ 歐陽起鳴，《歐陽論範》卷一，頁38-39。

¹⁴ 理宗謝皇后，〈哀痛詔〉，曾棗莊主編，《全宋文》（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第347冊，頁162。

¹⁵ 參看錢雲，〈陰陽與華夷：宋代中國對外關係理論的嬗變與展開〉，待刊；韋兵，〈完整的歷史經驗：天下的「夷狄之維」〉，《學術月刊》2013.6：153-158。

¹⁶ 陸秀夫，〈授文天祥通議大夫右丞相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詔〉。「裔虜之猗夏」，道光刊本《宋左丞相陸公全書》改作「北兵之奄及」。見曾棗莊，《全宋文》第359冊，頁312-313。

張佳

終」，¹⁷ 將蒙元軍隊看作氈裘異類。直到崖山戰敗，南宋遺臣梁起（廣州人）依然不願承認亡國的事實，還在聯絡友人俟機起事，理由是：

或者天地有知，必不忍以帝王萬世之統沒於旦夕；祖宗有靈，必不忍以中州億萬姓之命陷於腥羶……倒其首而加之足，獸不甘心；服左衽而言侏離，誰肯屈膝？¹⁸

宋亡後，謝枋得（1226-1289）鼓勵朋友堅定遺民志節，亦謂「夷狄不可為諸夏之王（按，當為『主』之誤），古今未有絕正統之時」，¹⁹ 堅信宋室定能復興。從上面這些例子不難看出，南宋抵抗蒙古，依然延續了對金使用的夷夏理論。蒙古與女真一樣，都被宋人視作夷狄，「首足倒置」、「陷於腥羶」便是他們對宋元易代的定位。

金朝雖然是女真政權，但入主中原之後便開始迅速漢化，並以中國正統自居。²⁰ 值得玩味的是，當蒙古南下攻掠、金軍節節潰敗之時，金朝士大夫也以夷夏理論自衛，做法一如南宋之抗金。端平元年（1234），南宋北伐佔領彭城，意外得到了「亡金人手抄詩冊」，裡面有兩首有關蒙金戰事的長詩，其中詠贊殉國金將的〈哀王旦〉篇云：

八月風高胡馬壯，胡兒彎弓向南望……將軍盡出兵如水，燒胡之車破胡壘……叛臣暗作開門策，一虎翻為群犬獲……²¹

雖然是金朝士人所作，詩中卻徑直將蒙古軍隊稱作「胡兒」、「胡馬」、「胡車」、

¹⁷ 區仕衡，《九峰先生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32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清刻本影印），卷一，〈糾集鄉兵書〉，頁625上。按，此文已將元軍稱作「北兵」，似乎已經後人諱改。

¹⁸ 梁起，〈與馬南寶書〉，曾棗莊，《全宋文》第359冊，頁295-296。

¹⁹ 謝枋得，《疊山集》（收入《四部叢刊續編》第70冊，上海：上海書店，1984，據明刊本影印），卷五，〈與李養吾書〉，頁2上。此二句清嘉慶刊本作「聖神乃為天下之主，古今未有絕道統之時」，見熊飛等，《謝疊山全集校註》（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頁14。

²⁰ 參看劉浦江，〈女真的漢化道路與大金帝國的覆亡〉、〈德運之爭與遼金王朝的正統性問題〉，氏著，《正統與華夷：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7），頁235-273, 7-16。

²¹ 陳郁，《藏一話腴》（收入《叢書集成新編》第87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據《適園叢書》本影印），甲集卷下，頁5中。《豫章叢書》本《藏一話腴》（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88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4），此條被刪去。

「胡虜」。²² 宋人的記載或許未可盡信，幸運的是，我們從金代遺留的、不易改竄石刻資料中，依然可以發現類似的表述。貞祐二年（1214），成吉思汗幼子拖雷南下虜掠山東郡縣，官員李演因濟州城破，不屈而死。金宣宗命立碑表彰（碑刻拓片，見附錄三），碑文稱李演被俘後：

虜中素聞其名，意欲得而使之也……（蒙人）使之跪，曰：「大官可得也」。公（按，李演）曰：「我進士第一人，重有祿位，汝何禽畜，吾豈為汝使哉！」²³

文中徑稱蒙軍為「虜」。²⁴ 有意思的是，清人張金吾（1787-1829）《金文最》中的本碑錄文，不僅將「虜」改為「敵」，還通過增字的辦法，將「汝何禽畜，吾豈為汝使哉」一句，改讀為「汝何禽畜吾，吾豈為汝使哉」。²⁵ 藉由清人的諱改可以確證，原碑文所要表達的，正是「夷狄禽獸」這一最為嚴厲的詆辱。讓人驚異的是，如此極端的夷夏情緒表達，居然出自金朝文臣之手。類似表述，在金末碑刻中非是孤例。正大六年（1229），河中府重修供奉戰神的玄武殿，碑記禱辭部分有云：

今也胡運告終，王師屢捷，行將盡復舊疆，神必有知之……下民厭亂久矣，神必有察之，必能請命於天，攘斥醜虜，陰有以相之也。將見招呼風雲、掃清妖氛、洗滌山川、復還舊觀，神之力居多焉。²⁶

「胡運告終」、「盡復舊疆」、「攘斥醜虜」、「洗滌山川」，碑文的語氣竟與宋

²² 稱蒙古為「胡」之例，還見興定二年之〈增修雲山崇慶院記〉，胡聘之，《山右石刻叢編》（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90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清光緒刊本影印），卷二三，頁551下。

²³ 崔禧，〈大金故應奉翰林文字贈濟州刺史李公碑銘並序〉，王昶，《金石萃編》（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89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清嘉慶刊本影印），卷一五八，頁64下。關於蒙軍攻克濟州的背景，亦見碑文所附王昶之考證。本碑亦收入畢沅，《山左金石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91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清嘉慶刊本影印），卷二〇，文字與《金石萃編》無異。校按：本例及下文〈大金河中府重修玄武殿記〉、〈澤州圖記〉兩例，熊鳴琴《金人「中國」觀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已先於筆者檢出；關於金末的「中國」認同與夷夏語境，可參看此書頁237-244。

²⁴ 稱蒙古為「虜」、「虜寇」之例，還見貞祐五年立〈金抹撚公德政碑〉，參崇禎《乾州志》（收入《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匯刊》第15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卷下，頁176-177。本碑亦可參張金吾，《金文最》（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65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清光緒江蘇書局刻本影印），卷四一，頁540上。但對蒙軍之稱諱改為「敵」、「敵寇」。

²⁵ 張金吾，《金文最》卷四五，頁587上。

²⁶ 李獻能，〈大金河中府重修玄武殿記〉，胡聘之，《山右石刻叢編》卷二三，頁554上。

張佳

人如出一轍，若不了解寫作背景，極可能被誤解為南宋對金的作戰宣言。金人依據華夷觀念貶抑蒙古的文字，在傳世文獻當中，亦見於趙秉文的《閒閒老人滏水文集》。趙氏指斥外敵不遺餘力，對蒙古以「胡」、「夷」、「虜」相稱，而自居為「華」、為「中國」。他回顧蒙古崛起的歷史，便稱：

大安失馭，不蠲厥政；胡馬南牧，華風不競。²⁷

在他看來是衛紹王時期馭外無方，才導致蒙古興起，此後的結果便是國勢日蹙，「華風不競」。正如研究者指出的，上述言論反映了金人的漢化以及漢族士人對金政權的認同，²⁸ 同時也向我們展示了一個不太為人所知的事實：和自認為延續了中國正統的南宋一樣，金朝末也用儒家的夷夏觀念，作為抵抗北方侵略的理論工具。

從上面分析的各類史料可以看到，南宋甚至金末，士人都曾籠罩在夷夏話語當中；華夷理論，是宋、金抵抗蒙古的重要思想資源。然而從現存文獻看，宋金士人筆下的這類論調，進入蒙元之後驟然消歇；隨著朝代改易，華夷觀念似乎從南北士大夫的思想世界中即刻淡出。思想潮流的變遷，理應有一個較長的過程；而金蒙 / 宋元之際的思想轉換，為何會顯得如此迅速？這是值得追索的問題。

三·政治壓力與元初遺民話語的抑制

檢讀元初文獻，會發現一個令人不解的現象：即使在華夷觀念長期浸淫的南宋舊地，原先充斥在士人當中的夷夏論述，也變得難以尋覓；即便在堅定的宋遺民那裡，這類文字也寥若晨星。宋遺民面臨的是種族與政權的雙重更迭，然而「華夷之辨」與「君臣大義」兩個思想維度，他們表現出來的似乎只有後者。²⁹ 細繹各類文獻可以發現，其實這並不意味著元初士人與政權更迭同步發生了思想轉向。文獻記載的「反常」，其實是政治壓力的結果。

學者藍文徵（1901-1976），曾對元代的「思想言論著作自由」給予很高評價，很能代表學界對此的一般看法：

²⁷ 趙秉文，《閒閒老人滏水文集》卷一八，〈宣宗哀冊〉，頁4b。

²⁸ 陶晉生，〈金代的中國知識分子〉，氏著，《宋遼金史論叢》（臺北：聯經，2013），頁465-466。

²⁹ 姚大力教授曾以謝枋得和文天祥為例，討論過這一問題。參看姚大力，〈面對故國的忠誠〉，氏著，《追尋「我們」的根源——中國歷史上的民族與國家意識》（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頁324-326。

元代八九十年間，漢人之衣冠禮樂，悉仍舊貫，未曾薙髮易服。思想言論著作亦自由，一任謝皋羽〈西台慟哭〉，鄭思肖唱〈元韃敗北歌〉，王伯厚寄故國憂思於《困學紀聞》，胡三省申民族大義於《通鑑》註中，迄未興文字之獄。³⁰

藍氏這段評述，對相關史事多有誤解，並不允當。誠然，元代法網並無明初嚴密，文網更不能望清人之項背，³¹ 然而這不意味著元代沒有言論管控、或者士人不會面臨政治壓力。

與殘酷的金蒙戰爭相比，蒙古征服南宋的過程較為平和，基本保留了南方長期積累的經濟與文化成果，這是學界共識。然而這種相對的平和，卻是以屠戮作為威脅手段，才實現的。³² 元軍南下過程中，先後屠樊城、³³ 屠沙洋、³⁴ 屠常州、屠興化、屠潮州、³⁵ 屠上猶，³⁶ 人心震恐。尤其是至元十二年（1275）十一月慘烈異常的常州屠城，³⁷ 給宋人造成了極大的心理恐慌，成為許多南宋州縣望風而降的原因。時人劉壘（1240-1319）回憶說，「德祐乙亥冬，毗陵以不屈屠，蘇湖風靡，

³⁰ 藍文徵，〈孫克寬先生元代漢文化之活動序〉，孫克寬，《元代漢文化之活動》（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8），頁3。

³¹ 目前已知的元代因文獲罪的大案不多，個案研究可以參看毛海明，〈桑哥輔政碑事件探微——以翰林官僚張之翰的仕宦轉折為線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7.3（2016）：611-668。

³² 這一點陳得芝已經指出，參看〈論宋元之際江南士人的思想和政治動向〉，頁154。

³³ 事在咸淳九年（1273）正月。鄭思肖謂元軍「盡殺樊城軍民，積疊骸骨，架為高山，使襄陽望見，脅嚇其心」，見鄭思肖著，陳福康校點，《鄭思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頁160。

³⁴ 事在咸淳十年（1274）十月，見程鉅夫，《楚國文憲公雪樓程先生文集》（收入《元史研究資料彙編》第26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據清宣統二年[1910]陶氏涉園影明洪武刊本影印），卷八，〈梁國何文正公神道碑〉，頁333。

³⁵ 興化、潮州兩屠，在景炎二年（1277）十月、三年（1278）二月，分見陳桎，《續資治通鑑》（收入《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第5輯史部第17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據元刊本影印），卷二四，頁442上，443上。

³⁶ 事在己卯（1279）三月十五日，上猶「一千四百一十六家之生靈，玉石俱焚」，「萬有餘人，同日而死」。見黃文傑，〈上猶縣治記〉，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鳳凰出版社，1997-2004），第46冊，頁129-130。

³⁷ 屠城之後，常州幾為空城。《泰定毗陵志》稱「本郡兵火後，至元十二年冬，招到在城土居人戶僅數十家」。見王繼宗校注，《永樂大典·常州府》清抄本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6），卷四，頁164。

張佳

明年孟春，行都震動」；³⁸ 方回（1227-1307）獻嚴州，亦以保全百姓為說，謂「合眾官吏軍民，一口同詞，惟恐有如常州之難，議定歸附」。³⁹ 值得玩味的是，常州屠城震動極大，然而其在元代卻長期是一個禁忌話題，鮮少有人提及。與屠城相比，士人反而更熱衷讚頌元軍統帥伯顏之「不殺」。⁴⁰ 即便為掩埋常州遇難者而作的〈義塚記〉，也要首先稱頌「大元以神武不殺一區宇」。⁴¹ 江南附元之初極不穩定，各地民眾起事不絕，⁴² 元軍對此採用了殘酷的鎮壓手段，元朝廷臣胡祗通（1227-1295）謂江南「自收附以來，兵官嗜殺」，「一縣叛則一縣蕩為灰燼，一州叛則一州莽為丘墟」。⁴³

除去屠戮恐嚇之外，元廷也非常注重在文化上樹立征服者形象，削弱南人的抵抗意志。至元十四年（1277），元世祖「命中書省檄諭中外，江南既平，宋宜稱曰『亡宋』」，⁴⁴ 以此顯示宋統已絕；又施行壓勝之術，命僧人「建塔於宋故宮」。⁴⁵ 元廷對於南人是否思宋，非常在意。忽必烈聽說江南道觀依然供奉宋朝皇帝，大怒，「言僧當致之大辟」，雖經文臣勸止，⁴⁶ 但元貞元年（1295），元成宗還是下令江南諸路道觀，「毀所奉宋太祖神主」。⁴⁷ 元初的輿論環境，也非常敏感，並不如後人想像的寬鬆。時人周密（1232-1298）記下了一個因文獲罪的例子：

³⁸ 劉壘，〈趙道深墓誌〉，李修生，《全元文》第10冊，頁419。

³⁹ 方回，《桐江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32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宛委別藏清抄本影印），卷八，〈先君事狀〉，頁489下。方回多次提及蒙古屠城的威懾，如記金朝邳州之降，謂蒙軍威脅「不好投拜，破城之日，無男女齠齏不留」，金將遂降，參方回，〈元兀林答碑〉，李修生，《全元文》第7冊，頁399。

⁴⁰ 元人對伯顏以「不殺」平江南的讚頌甚多，如鄧錡〈平宋錄序〉即稱伯顏平江南非用計謀，而「以仁義不殺為主」（見李修生，《全元文》第36冊，頁238）。然而實際在滅宋戰爭中，伯顏並沒有放棄遇抵抗則屠城的作法。程鉅夫記「南征，丞相伯顏令軍中『敵我者屠之』，多殺戮」，部將何瑋勸諫不及，遂有沙洋之屠，見程鉅夫，《楚國文憲公雪樓程先生文集》卷八，〈梁國何文正公神道碑〉，頁333。這些屠戮給宋人帶來了巨大的心理震懾，多數地區因此放棄抵抗。「不殺」與其說是元軍的政策，不如說是宋人望風歸降導致的結果。

⁴¹ 蕭燞，〈義塚記〉，王繼宗，《永樂大典·常州府》清抄本校注卷一七，頁1107-1108。

⁴² 參看黃清連，〈元初江南的叛亂（1276-1294）〉，《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9.1（1978）：37-76。

⁴³ 胡祗通，〈民間疾苦狀〉，李修生，《全元文》第5冊，頁604-605。

⁴⁴ 《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卷九，頁193。

⁴⁵ 《元史》卷一四八，頁3499。

⁴⁶ 蕭燞，〈元故特授大司徒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冀國公推誠宣力保德翊戴功臣諡忠宣石公神道碑銘〉，李修生，《全元文》第10冊，頁758。

⁴⁷ 《元史》卷一八，頁396。

鹽官縣學教諭黃謙之，永嘉人，甲午歲（1294）題桃符云：「宜入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為人告之官，遂罷去。⁴⁸

「怎生呵」、「那般者」是元代硬譯體公文的常用語，作者寫入對聯以為文字遊戲，未必另有深意，然而竟因此獲罪去官。至元庚寅年（1290），宋遺民、鎮江人梁棟（字隆吉）所罹之「詩禍」，影響更大。梁氏登臨茅山，作詩有謂「大君上天寶劍化，小龍入海明珠沉」、「安得長松撐日月，華陽世界收層陰」，遭人揭發「謗訕朝廷，有思宋之心」，遂「以譏時逮捕金陵，備嘗笞楚」，經達官營救方得開釋。⁴⁹

在這種敏感微妙的文化環境下，許多士人感受到壓力，不僅諱言先朝之事，有人甚至努力去迎合新朝的立場。元人周霆震（1292-1379），曾讀到宋元之際王炎登所著《江南野史》，其書「不錄文丞相、以呂文煥賣降為不得已」。王氏不記載文天祥抗元事蹟，並且為降臣呂文煥開脫，周霆震不由感嘆「古今興廢之際，談者惟務趨時，諱稱先代」，遂致歷史失真。他甚至發現，江南「自革命以來，學校碑刻悉刊去宋年號」。⁵⁰ 雖然沒有政府的直接指令，但學校「刊去宋年號」，無疑是在政治壓力下的舉動；宋元易代之際「諱稱先代」的程度，也於此可見一斑。

在敏感的文化環境下，宋遺民對故國之思的表達，也變得委曲甚至隱秘。錢塘人汪元量（1241-1317），宋亡後隨幼君一同北上，寫作了大量詩歌。汪氏南歸後，其詩集曾在遺民中廣泛傳閱。遺民周方讀汪氏之詩，「至丙子（按，1276）以後，為之骨立，再嫁婦人望故夫之壟，神銷意在而不敢出聲哭也」，⁵¹ 委屈抑鬱之情，溢於言表。遺民的故國之思無法明白宣示，大多只能委曲暗喻，甚至需借助廝辭隱語。明初胡翰（1307-1381）評論遺民謝翱（1249-1295）之詩文：

其辭隱，其指微，大要類其（按，謝翱）行事。是時元新有天下，士大夫於宋事多諱書之。⁵²

⁴⁸ 周密，《癸辛雜識》（北京：中華書局，1988），續集下，「桃符獲罪」條，頁195。

⁴⁹ 梁棟詩禍案，參看蔣正子，《山房隨筆》（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156冊，據《藕香拾零》本影印），頁2下；《至正金陵新志》（收入《宋元方志叢刊》第6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影印），卷一四，頁5913下-5914上；孔克齊，《靜齋至正直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16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清抄本影印），卷二，頁310-311。方回遭遺民仇遠（1247-1326）作詩譏諷，也曾試圖借詩文羅織仇氏罪名、赴官舉首，但為人勸止，參看周密，《癸辛雜識》別集上，「方回」條，頁251。

⁵⁰ 周霆震，〈閱晏彥文所論王生江南野史〉，李修生，《全元文》第39冊，頁162。

⁵¹ 周方，〈跋〉，汪元量，《湖山類稿》（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107冊，據《武林往哲遺著》本影印），卷五，頁495上。

⁵² 胡翰，《胡仲子集》（收入《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據《金華叢書》本排印），卷九，〈謝翱傳〉，頁128。

張佳

「隱晦」，是宋遺民在政治壓力下寫作的特點，這並非是明朝人的偏見。元人任士林 (1253-1309) 評謝翱之詩，亦云「其稱小、其指大，其詞隱、其義顯」。⁵³ 而同為遺民的鄭思肖，在公開語境下，書寫更為怪異：

（鄭氏）扁其室曰「本穴世界」，以「本」字之「十」置下文，則「大宋」也……嘗著《大無工十空經》一卷，「空」字去工加十，宋字也，寓為《大宋經》，造語奇澀如廋詞，莫可曉。⁵⁴

鄭氏不敢直書「大宋」而將其拆解為「本穴」、「大無工十空」，著書卻「造語奇澀如廋詞」，這種怪異的書寫方式，只有在元初政治壓力的背景下，才能得到解釋。

在公開文字裡，遺民的故國之思尚不能直抒胸臆，而與本朝有關的「華夷之辨」，更是禁忌。元代士人討論經史時提到「夷狄胡虜」等字樣，並不算違禁，⁵⁵ 但若用以指稱本朝卻是大忌。例如元刊本《宋史全文》，在記載宋遼金交涉時，並不避諱上述字樣；而在記載宋理宗之後的宋蒙交涉時，便出現了大量的黑方闕字；與其他版本對勘可知，元刊本所闕多是「虜」字（參看附錄二圖五）。⁵⁶ 元刊本胡三省 (1230-1302)《資治通鑑注》，不僅將「我朝」、「國朝」等帶有遺民口吻的字樣改為「宋朝」，還把胡三省將元滅宋與「遼滅晉、金破宋」一併評論的十六字劃去（參看附錄二圖三、四），⁵⁷ 因為這有將元朝與遼金同視為夷狄的嫌疑。

在元初緊張的政治氛圍裡，士人著述多所避忌，夷夏情懷自然無法暢言。今天還能看到宋元之際不少因為政治壓力，而隱晦變形的文本。與宋遺民一樣經歷

⁵³ 任士林，〈謝翱傳〉，李修生，《全元文》第18冊，頁431。

⁵⁴ 佚名，〈鄭所南小傳〉，程敏政輯，《宋遺民錄》（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88冊，據明嘉靖刊本影印），卷一三，頁532下-533上。

⁵⁵ 相關例證如劉基之例的討論，可以參看朱鴻林，〈劉基《春秋明經》的年代問題〉，《浙江工貿職業技術學院學報》6.4 (2006)：4-12。

⁵⁶ 參看汪聖鐸點校，《宋史全文》（北京：中華書局，2016），〈點校說明〉，頁4。點校者推斷「空鉛處大約原來都是蒙古統治者最忌諱的『韃』字或含『韃』的字詞」。需要說明的是，元代「韃」字作為族名並無貶義，當時並不避諱。參看蔡美彪，〈元代文獻中的達達〉，氏著，《遼金元史考索》（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207-214。正如點校者後文將元刊本與他本比勘發現的，元刊本所闕，多是「虜」字。

⁵⁷ 參看陳垣，《通鑑胡注表微》（收入陳智超主編，《陳垣全集》，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9，第21冊），〈本朝篇第一〉，頁1-17。根據上海圖書館所藏元刊初印本，被劃去的十六字為「達韃又滅金，皆蹈藉中國，如涉無人之境」。參看郭立暄，〈元本《通鑑》胡注校餘述略〉，《文史》2020.3：157-186；更多元刊後印本《通鑑》胡注的闕文避諱，參看秦蓁，〈新見上圖藏元本胡注《資治通鑑》初讀記〉，《文匯報·文匯學人》2020.08.07。

了夷夏更迭的顧炎武，敏銳地指出這種文本變形現象。《日知錄》「古文未正之隱」條云：

文信國〈指南錄序〉中「北」字皆「虜」字也。後人不知其意，不能改之。謝泉羽〈西台慟哭記〉，本當云「文信公」，而謬云「顏魯公」，本當云「季宋」，而云「季漢」。凡此皆有待于後人之改正者也。⁵⁸

後世所見到的文天祥《指南錄》前後序，多用「北」指稱元軍，如「北兵」、「北營」之類，顧炎武認為這非文氏本意。他援據鄭思肖的說法，認為這是「傳書者所改」的結果。⁵⁹ 鄭思肖稱，他原先見到的「舊本」〈指南錄序〉，與後來流傳的本子頗有不同：

公（按，文天祥）自序本末，未有稱賊曰「大國」、曰「丞相」，又自稱「天祥」，皆非公本語。舊本皆直斥虜酋名，不書其僭偽語。觀者不可不辨，必蔽於賊者畏禍易為平語耳。詩之劇口罵賊者，亦以是不傳。⁶⁰

也就是說，元初流傳的只存忠君之心、而無華夷之見的〈指南錄序〉，其實是在壓力之下改造變形的結果，並非文天祥之本意。文氏《指南錄》今有宋元之際刊印本，先後經毛晉（1599-1659）汲古閣、陸心源（1838-1894）皕宋樓收藏（今存靜嘉堂文庫，參看附錄二圖一、二）。陸心源〈宋槧《指南錄》跋〉，稱其版式特徵為：

⁵⁸ 顧炎武撰，黃汝成集釋，樂保群點校，《日知錄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卷一九，頁1114。

⁵⁹ 宋元之際文獻遭傳寫者改竄者，不獨《指南錄》一例。遺民謝枋得〈上程雪樓御史書〉之名句「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前二句日本萬延元年（1860）刊本《謝疊山文鈔》作「○○制世，民物一新」，書頁天頭刻有註文曰「公於元國號及年號，皆缺而不書，蓋公微意所在，今不妄填補，讀者宜以意逆之」（見熊飛等，《謝疊山全集校註》卷前書影）。在《四部叢刊續編》景明刊本《疊山集》中，此句已補填「大元」國號，但篇內其他刊本中的「皇帝」二字，依然闕作「○○」。閱讀這種補葺之後的文本，容易讓人產生謝枋得「有痛於宋，而無對於元」的錯覺。

⁶⁰ 鄭思肖，《鄭思肖集·心史》，〈文丞相敘〉，頁129。鄭思肖看到的這種諱改本，今天已不可見。文天祥之全集，最早刊刻於元貞二年（1296），但僅收錄「寶祐乙卯至咸淳甲戌（1255-1274）」之間的作品，而從起兵抗元到被俘入燕期間諸作，「如《年譜》、《集社》、《指南錄》，則甲戌已後之筆，不在此冊」，參元貞二年道體堂刊本《文山先生集》序，文天祥，《文山先生文集》（明景泰刊本，北京：國家圖書館藏），卷首。上述內容選擇，無疑也是政治忌諱的結果。今日所見的文氏全集，內容來源複雜，有些來自文氏原稿，有些則來自元人加工過的各種本子。相關研究參看近藤一成撰，尤東進譯，〈文天祥的「自述」與「他述」——以文天祥全集的編纂為中心〉，《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10：49-60。

張佳

〈序〉中「北兵」、「虜帥」、「呂師孟」、「北虜」，「誤吾國」之「誤」字，「陷吾民」之「陷」字，「罵逆賊」之「逆賊」字，及「文天祥」三字，皆挖空。詩中挖空處甚多，當是景炎（1276-1277）中刊本，入元後挖去者。此則元時印本也。⁶¹

一九二九年傅增湘（1872-1949）至日本訪書，也曾在靜嘉堂目驗此本，稱：

此本卷中，凡「虜帥」「逆賊」及「文天祥」字、又詩中避忌處，皆成空格。蓋板刻于宋末，元初乃挖板印行耳。⁶²

陸心源和傅增湘根據剗板的内容推斷，這個版本的《指南錄》應當是宋末刊刻、元初印行的本子。宋末刊刻時可以肆言無忌，而一旦入元之後，許多内容就變得不合時宜。「虜帥」「北虜」等帶有夷夏色彩的指斥詞首當其衝；降元宋將此時已經成為炙手可熱的新貴，「逆賊」「呂師孟」等詞也應迴避。而作為宋末抵抗派的代表，文天祥身分敏感，元初為人諱言。前文所引宋元之際王炎登著《江南野史》不載文氏事蹟，而這個版本的《指南錄》，也將文天祥的名字一併挖去，以掩人耳目。根據這些剗板避諱的細節，我們不難體味元初江南緊張的政治與文化氛圍。對於時局之變，士大夫或掩口噤聲，或支吾其詞，由此也便可以理解了。

元初因忌諱而變形的文本，並不止《指南錄》。顧炎武所指出的宋遺民謝翱名作〈登西台慟哭記〉，也是顯著的一例。謝翱早年曾入文天祥幕府，文氏被殺之後，至元二十七年（1290）謝氏約集友人在子陵台下祭奠文天祥。〈登西台慟哭記〉便是對此事的記錄，然而文字極為壓抑，「多忌諱隱語」。⁶³ 例如，文中不稱「文丞相」，而假託為「唐宰相魯公」（顏真卿）；與祭友人不稱真名，而記作「友人甲乙若丙」，讀來令人費解。元明之際的張孟兼（1338-1377）、明清之際的黃宗羲，都曾為之作註，試圖闡發其中幽隱。有意思的是，與張孟兼同時的浙人徐尊生（贅民，1320-?），稱其家「有先子手抄謝皋羽詩文一編」，這個抄本的文字，與張孟兼本頗多不同：

⁶¹ 陸心源，《儀顧堂續跋》（收入馮惠民整理，《儀顧堂書目題跋彙編》，北京：中華書局，2009），卷一二，頁424-425。

⁶² 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北京：中華書局，2009），卷一四，頁1067。

⁶³ 黃宗羲，《西台慟哭記註》（收入吳光編，《黃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第2冊），頁243。

先子所載本，篇首稱「丞相信公」（按，即文天祥），不稱「故人唐宰相魯公」，篇中又無「榜中人始驚」以下至「移榜中流」數語。餘亦有數十字不同，似為善本。恨不得見張君，相與考其異同而定其句讀也。⁶⁴

徐尊生看到的抄本〈登西台慟哭記〉，是以近乎「明碼」的形式呈現的，張本的一些隱語並不見於其中，因此徐氏認為此本「似為善本」。〈登西台慟哭記〉的這兩種本子，很可能反映了抄本與刻本的文化差異。私人傳抄的文本流通範圍有限，因此較少顧忌，有時能保留文獻的原貌。⁶⁵ 而文本一旦刊印，便從隱秘的私人話語轉變為公開話語，不管作者還是刊行者都會承擔壓力，因此文本也不可避免地因忌諱發生變異。⁶⁶ 王汎森曾將權力壓迫下的文獻自我抑制現象，細分為寫作時的抑制和出版流通時的抑制等類型，⁶⁷ 〈登西台慟哭記〉隱語的產生，很可能是出於後者，用以防範在公開傳布流通時賈禍。

雖然某些細節依舊晦澀，依據張孟兼和黃宗羲的註釋，〈登西台慟哭記〉已經基本可以讀通。不過，有些文獻卻沒有如此幸運。元初西僧楊璉真伽發掘南宋六陵，是引起宋遺民強烈震動的事件，林景熙、唐珏、謝翱等人都有詩文紀其事。然而事涉敏感，諸家詩文只能隱約其辭。例如，曾經參與重葬宋陵遺骨的林景熙（1242-1310），便「不敢明言其事，但以〈夢中作〉為題」來暗喻。⁶⁸ 因此，究竟何人何時將宋陵遺骨安葬在何處，明清五百年間聚訟紛紜，莫衷一是。⁶⁹ 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正如清人萬斯同所言，當時身經其事者「或時有所忌，故紊其詞」，給後人的解讀造成了莫大的困擾。⁷⁰

元代文人所面臨的政治壓力，以及由此產生的文獻抑制現象，並不僅限於元初，到元代後期依然如此。金華人方鳳（1241-1322）和謝翱是好友，國亡後「遇遭

⁶⁴ 徐贇民跋，〈釋登西台慟哭記〉，張孟兼，《白石山房逸稿》（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6冊，據清刊本影印），卷二，頁204上。

⁶⁵ 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頁436。

⁶⁶ 抄本與刻本的差別，在《日知錄》流傳過程中即有體現，見陳垣，《通鑑胡注表微》，頁15-16；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頁383-385。

⁶⁷ 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頁379-400。

⁶⁸ 林景熙，〈夢中作四首〉元人章祖程註語，見氏著，陳增傑補注，《林景熙集補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頁317。

⁶⁹ 參看《林景熙集補注》附錄三〈收葬宋陵遺骨事及夢中作詩辨錄〉所收諸家意見，頁525-583。

⁷⁰ 萬斯同，〈書林唐二義士詩後〉，《林景熙集補注》，頁560。

張佳

民故老於殘山剩水間，往往握手獻欵」，⁷¹ 遺詩三千餘篇。⁷² 文學家黃潛 (1277-1357) 所作的〈方先生詩集序〉，稱其師詩歌「其語多危苦激切」，家人「懼時無知先生者，不敢輒以遺稿示人」。直到若干年後，才由另一門人柳貫 (1270-1342) 從中刪汰出「五七言古律詩三百八十篇」，刊刻行世。⁷³ 方鳳遺稿十遭刪九的經歷，曾引起明清之際讀者張燧的強烈感慨：

（柳氏刊方集）乃何僅摘詩篇，止取十一，尚懼無知輒難傳示？嗟夫，予知之矣。大抵先生所遭，既變出未經，而先生所懷，尤憤懣特過。其情旨之激切，音調之淒愴，當有不止於是者。當代公卿，不免嫌疑避忌。故遺編久秘，即出難全錄，即錄難久傳，往往然矣。以至世遠人更，遺音盡絕、百僅一存者，又安知不經改削者歟？⁷⁴

方氏家人「不敢輒以遺稿示人」，遺詩刊行時遭到大幅刪汰，毫無疑問是政治壓力下「嫌疑避忌」的結果。和名儒王應麟 (1223-1296) 相比，方鳳別集的出版還算幸運。王應麟以飽學著稱於世，留下了大量的學術和詩文作品。王氏身後《困學紀聞》、《玉海》等學術著作，都曾在官方支持下刊行，唯獨其別集《深寧集》沒有刊刻，以致其在元代散佚。後人輯佚，僅得五卷之數。對於王氏別集之不傳，民國學者張壽鏞 (1875-1945) 推測說：

（王應麟）文集凡百卷，世傳元時析產，割裂散佚。頗疑其間必多忌諱之作，而子孫毀之耳。不然，百卷之集僅存五卷，二十而存一，無是理也。⁷⁵

今天殘存的王應麟宋末草擬的詔敕，徑稱蒙人為「韃寇」、「醜虜」、「逆虜」，號召「攘夷」。⁷⁶ 王氏別集在元代不得刊行，是必然之事，張壽鏞「其間必多忌諱之作」、「子孫毀之」的猜測是有道理的。這裡需要說明的是，不僅元初遺民面臨

⁷¹ 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第239冊，據元刊本影印），卷一六，〈方先生詩集序〉，頁4a。

⁷² 宋濂著，黃靈庚點校，《宋濂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卷九六，〈浦陽人物記〉，頁2266。

⁷³ 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一六，〈方先生詩集序〉，頁4b。

⁷⁴ 張燧，〈序〉，方鳳，《存雅堂遺稿》（收入《存雅堂遺稿集成》第6冊，北京：學苑出版社，2015，據《續金華叢書》本影印），卷首，頁577-578。

⁷⁵ 張壽鏞，〈四明文獻集序〉，王應麟，《四明文獻集》（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106冊，據《四明叢書》本影印），頁995下。

⁷⁶ 分見王應麟，〈賜呂文德收復開州江面肅清獎諭詔〉、〈賜淮西置制大使夏貴獎諭詔〉、〈賜李庭芝詔〉、〈孫虎臣特授清遠軍節度使加食邑實封制〉等篇，曾棗莊，《全宋文》第354冊，頁145-146, 154, 173。

文字壓力，即便到元代中後期，文人也不能毫無避忌地寫作。王應麟的學生袁桷(1266-1327)是著名文學家，且曾長期擔任史官，他主持修纂的《延祐四明志》，是方志史上的名作。然而這部書在元代卻遭人告訐，「或有讒于簽事苦思丁，將毀其版」，經人勸解後才得以繼續印行。⁷⁷《延祐四明志》獲讒的具體原因已不可考，但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到，元代的言論與寫作空間，實非如後人想像的寬鬆。《延祐四明志》被後人批評的一點，是不為宋末闖家抗元而死的當地著名人物袁鏞(?-1276)立傳，其原因或許可以由此得到解釋。⁷⁸

在政治與文化壓力之下，宋遺民的話語受到了極大抑制，連表達故國舊君之思都要小心，更何況公開表述夷夏觀念。只有在這個背景下，我們才可以理解為何鄭思肖要滿懷悲憤，將傾注了一腔熱血的《心史》封藏井中。⁷⁹ 如果沒有《心史》在晚明的發現、單憑其傳世的詩文集來分析，鄭思肖將只是一位溫和型遺民，無從想像其有如此極端的族群意識。今天鄭思肖因其種族觀念之激烈，而被視作宋遺民中的特例。⁸⁰ 然而，考慮到元初遺民話語抑制的情形，鄭思肖的思想在遺民群體中可能未必另類。有些遺民行為之極端不亞於鄭氏，如四明人許月卿(1216-1285)效仿司馬氏專權後「足不履地」、「不言三十六載」的曹魏忠臣范滂(202-285)，⁸¹ 宋亡後「深居一室，但書『范滂寢所乘車』數字，於是不言五年矣，又如是而卒」。⁸² 許氏足不出戶，大概與鄭思肖畫蘭「不畫土，根無所憑藉」異曲同工，都是暗喻

⁷⁷ 貝瓊，《清江貝先生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第250冊，據明初刊本影印），卷三〇，〈故福建儒學副提舉王公墓誌銘〉，頁6a。

⁷⁸ 有學者認為，這是因袁桷編纂志書時，尚無袁鏞抗元事蹟流傳，參看熊燕軍，〈宋季忠義的歷史書寫研究——從袁桷《延祐四明志》未立袁鏞傳談起〉，《歷史人類學學刊》16.2(2018): 1-42。這一結論，建立在將時人王應麟的記載視為偽作的基礎上，而未考慮元代的政治忌諱與寫作壓力。錢大昕還曾注意到，袁桷在其著名的〈上修三史事狀〉中，僅建議搜求北宋遺事，「至于南渡七朝之記載，略不涉及，豈有所忌諱而不欲盡言與？」對於南宋歷史，相當謹慎。參看錢大昕，《潛研室文集》（收入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16，增訂本，第9冊），卷三一，〈跋清容居士集〉，頁504。

⁷⁹ 參看陳福康，《井中奇書考》（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

⁸⁰ 蕭啟慶將宋遺民分為「激進型」、「溫和型」、「邊緣型」三種類別，認為鄭思肖是「宋朝遺民中最具種族意識的」，認為鄭氏「以嚴格華夷區分正統與非正統的思想，當時並不多見」，參看蕭啟慶，〈宋元之際的遺民與貳臣〉，氏著，《元朝史新論》，頁104-111。但蕭先生似乎沒有考慮到，鄭思肖的觀念其實是南宋夷夏思潮影響的結果，入元後類似的人物不應該是少數。

⁸¹ 《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六四，頁2432。

⁸² 許飛，〈宋運幹山屋先生行狀〉，許月卿，《先天集》（收入《四部叢刊續編》第70冊，據明嘉靖刊本影印），附錄下，頁6a。

張佳

「地為番人奪去」，⁸³ 無處立足。然而與鄭思肖不同的是，許氏入元後行為怪異，但他的別集中卻未留下任何與之相關的文字自述，其思想觀念亦因之無從深論。這類行與言、或者公開話語與私人話語的脫節，應當歸因於元初政治環境對遺民話語的抑制。

北方士人在蒙元初期遭受的政治壓力，應當與宋遺民類似，只是因為文獻較少，難以如南方一般細緻討論。不過依然有若干痕跡可尋。海迷失后二年（1250），高麗文臣崔滋（1188-1260）出使蒙古，在興中府（今遼寧朝陽）一寺院牆壁上所見「客子」題詩，有謂「四海盡為狐兔窟，萬邦猶仰犬羊天。人間樂國是何處，深嘆吾生不後先」。⁸⁴ 從詩意來看，作者應該是一位金源遺士。不過，與南方相較，北方這類直抒胸臆的作品今天更為少見。金末文宗趙秉文（1159-1232）別集《閒閒老人滄水文集》中，有大量涉及金蒙交涉的內容。該集在元代曾經刊行，蘇天爵（1294-1352）謂「趙秉文文集乃國初刻本，亦多回護」，⁸⁵ 可以想像刊行時應有不少內容遭到改竄，以致修《金史》時蘇天爵建議訪求民間別本。今天所存的金源遺民文集，依然能看出某些諱改的痕跡。澤州地區在金代號稱繁華，蒙元初創殘已甚，七縣之民不足千戶。鄉人李俊民（1176-1260）回顧澤州由盛轉衰的歷史，不勝悲悼，稱「金國自大安之變，胡騎入中原，北風所向無不摧滅」。⁸⁶ 前文已經提到，所謂「胡騎入中原」、視蒙古為胡人，是金末以來士人的普遍看法。然而就在同一篇文字當中，卻又用稱頌的語氣，稱蒙方為「大兵」、「大朝」，與作者的情感迥然不侔。毫無疑問，這些褒揚性的詞彙是李氏文集在元代刊行時的諱改，而「胡騎」則是僥倖的漏網之魚，⁸⁷ 藉此後世方得以窺見李氏的真實心態。

貞祐二年（1214）蒙軍虜掠山東時，曲阜孔廟亦被燒毀，「殿堂廊廡，灰燼什

⁸³ 佚名，〈鄭所南小傳〉，程敏政，《宋遺民錄》卷一三，頁532下-533上。

⁸⁴ 崔滋，《補閒集》（收入蔡鎮楚編，《域外詩話珍本叢書》第8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卷上，頁69-70。

⁸⁵ 蘇天爵撰，陳高華點校，《滋溪文稿》（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二五，〈三史質疑〉，頁423。

⁸⁶ 李俊民，《莊靖先生遺集》（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107冊，據《山右叢書初編》本影印），卷八，〈澤州圖記〉，頁686下。

⁸⁷ 李俊民文集刊行於蒙古乃馬真后二年（1243），其時李氏尚在世，參看氏著，魏崇武等點校，《李俊民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點校前言〉，頁9-10。在文淵閣四庫本《莊靖集》中，「胡騎」被改成了沒有情感意味的中性詞彙「元兵」，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9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644上。

五，祖檜三株，亦遭厄數」，⁸⁸ 衍聖公孔元措（1181-1251）被迫出逃南京（開封）。正大四年（1227），孔元措在開封編成並刊行的《孔氏祖庭廣記》，對這場災難多有記載。《孔氏祖庭廣記》一書，目前存有大蒙古國王寅年（乃馬真后元年，1242）「增補校正」後的重刻本。⁸⁹ 提及金季焚廟的背景，《廣記》一則曰「貞祐二年正月十四日，兵災及本廟，再則曰「貞祐甲戌春正月，兵火及曲阜」，⁹⁰ 僅僅泛言「兵災」、「兵火」，諱言毀廟的責任者。孔子手植檜被毀後，曾在開封刻石紀念，趙秉文作〈手植檜刻像記〉，王寅本《廣記》收錄此文，云「貞祐初，兵革擾曲阜，焚孔檜」，⁹¹ 亦不言肇事者。然而有意思的是，明代「參閱孔氏所藏《祖庭廣記》與凡遺碑斷刻、諸書所載」⁹² 而纂成的《闕里誌》，基本承襲了《廣記》上述紀事，但對毀廟者卻有明確記載：上引王寅本《廣記》中的含混記載，分別寫作「北虜犯本廟」、「北寇犯曲阜」；趙秉文之〈手植檜刻像記〉，亦寫作「貞祐初，虜寇犯曲阜」。⁹³ 前文已經指出，用「虜」、「寇」等詞指稱蒙軍，乃是金季士大夫的慣例；「北虜」、「北寇」、「虜寇」這些詞彙，並非是明人對前代文獻的追改，⁹⁴ 而是說明《闕里誌》有比王寅本《廣記》更為原始的史料來源。可以推想，蒙古王寅年《廣記》「增補校正」再次重刊時，昔日之「虜寇」，已為今日之司命大君，這些敏感詞彙不得不進行改動；孔氏對蒙軍之行為亦不敢顯斥，關於肇事者只能用「兵災」之類無所確指的含混詞語帶過。

⁸⁸ 孔元措，《孔氏祖庭廣記》（收入《四部叢刊續編》第14冊，據蒙古刊本影印），卷九，〈金修廟制度〉。

⁸⁹ 蒙古王寅本《孔氏祖庭廣記》書末題記云：「大蒙古國領中書省耶律楚材奏准皇帝聖旨，於南京特取襲封孔元措，令赴闕里奉祀。來時不能挈負《祖庭廣記》印板，今謹增補校正，重開以廣其傳。王寅年五月望日。」關於《孔氏祖庭廣記》的編纂與刊行背景，參看李博，〈《孔氏祖庭廣記》的編纂特色與史學價值〉，《濟寧學院學報》40.4 (2019)：58-63。

⁹⁰ 以上兩則，分見孔元措，《孔氏祖庭廣記》卷九，〈廟中古蹟〉、〈金修廟制度〉。

⁹¹ 孔元措，《孔氏祖庭廣記》卷九，〈廟中古蹟〉。

⁹² 李東陽，〈闕里誌序〉，陳鏞，《闕里誌》（收入《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第407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據明正德元年刻增修本影印），卷首，頁2。根據李氏之〈序〉，此書還參考了《孔氏實錄》、《孔庭纂要》等書。

⁹³ 陳鏞，《闕里誌》（收入《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第407冊），卷四，〈林廟〉；卷九，〈撰述一〉，頁89, 190。

⁹⁴ 在金元之際的語境中，「北虜」、「北寇」、「虜寇」等詞所指明確；而易代之後，金末這段擾攘的歷史已不太為人所知，若是明人追改，會用更為明白的指代詞。

張佳

按照一般觀念，草原文化原始粗樸，蒙元（尤其早期）不存在漢族王朝那樣的思想輿論控制。但事實並非如此。眾所周知，全真教因丘處機（1148-1227）西行而大獲信任，成為蒙元在漢地的重要代理人。然而一二三〇年，就在二者合作的蜜月期，卻發生了因壁畫獲罪的處順堂事件。丘處機去世後，瘞蛻於長春宮處順堂，其門人弟子將丘氏覲見成吉思汗的經歷，繪於處順堂壁。因全真教將丘氏「西遊」與老子出關「化胡」相比附，遂引起蒙古統治者不滿。「有誣告處順堂繪事有不應者」，掌教真人尹志平「即日被執，眾皆駭散」。⁹⁵ 這一事件雖未如後來憲宗、世祖時釋道辯論失敗、焚毀道藏經版那般慘烈，⁹⁶ 但在當時也引起不小的波瀾。從上述例子來看，蒙元初期北方士人的文化環境，也並不算寬鬆；夷夏話語的抑制，當是南北方共同的現象。

四·元代漢人的族群意識與夷夏觀念暗流⁹⁷

上文已經指出，宋金末年熾盛的夷夏論述在元初文獻中驟然止息，是遺民話語受到抑制的表現，並不意味著士人觀念隨著王朝更迭而即刻轉向。強調漢人與北方民族差異的「華夷之辨」、「夷夏之防」等思想，入元之後退出了士人的主流話語，成為一種被壓制的暗流。不過，即便出於被抑制的狀態，文獻中也還不時能見到一鱗半爪，並非全然無跡可尋。

（一）「我故國之人也」：江南士人的懷宋現象

蒙元征服江南之初，並未立即被南方士人視作中國之主，許多人依舊將其視為

⁹⁵ 王鶚，〈玄門掌教大宗師真常真人道行碑銘〉，李道謙，《甘水仙源錄》（收入《正統道藏》第19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卷三，頁745下。關於處順堂壁畫事件的研究，參看胡春濤，《老子八十一化圖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12），頁29-31。

⁹⁶ 這段重要歷史為全真教史所諱言，不僅因為玄門蒙羞，亦與政治壓力有關。陳垣發現，因為政治忌諱，全真教早先整理刊行道藏之事，焚經之後在道教史料中遭隱匿改易。參看陳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收入陳智超，《陳垣全集》第18冊），卷一，〈藏經之刊行第五〉，頁420-421。

⁹⁷ 本文稱的「漢人」，不是元代習指的曾在金人統治下的中原人群，而指中原和江南地區使用漢語、或者主要生活在漢文化傳統下的人群。其實，即便在元代，「漢人」也有指代漢文化群體的意味，例如〈至正二十六年國子中選生題名記〉中的泉州人蔡玄，即被稱為漢人。元代政令用「漢人」一詞來賅括南北兩地的漢語人群，亦為常見。相關例證可以參看蕭啟慶，《元代進士輯考》（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2），頁27, 460。

夷狄。一二七七年，林景熙經過「朔騎壓境，所過殺掠，數十里無人煙」的北塘，看到鬼火四起，不禁追思這場巨禍的由來，謂「人失人之常，鬼行其怪；中國失中國之常，夷行其怪」，⁹⁸也即是南宋的內政紊亂，最終造成了元軍南下、江南失陷。「以耆年宿德、擅文章之柄而雄視乎東南」⁹⁹的遺民牟巘（1227-1311），至大二年（1309）回顧常州陷落的經過，稱「咸淳甲戌，大虜自沙武口冒雪逕渡至馬洲，遂攻毗陵」，¹⁰⁰此時入元已三十年，牟氏依然稱呼元軍為「大虜」。廬陵人鄧光薦（1232-1303）崖山戰敗投水，被元軍救起，後任教於元軍統帥張洪範的家塾。文天祥的墓誌，即出於鄧氏之手。墓誌遵循元朝功令，用至元紀年，但在解釋文天祥的支持者何以「亡家沉族、折首而不悔」時，認為原因之一是「人心思向中國，未□趙氏」，¹⁰¹潛意識裡仍不把元朝視作「中國」。作為宋元之變的親歷者，鄧光薦晚年「以所見聞集錄為野史若干卷，藏不示人」。元末朝廷為修《宋史》徵書，其子孫依然遲疑不敢獻上。¹⁰²鄧氏野史所書寫的，大約都是站在宋人立場、干犯時忌的內容。

元初士人的夷夏觀念不僅體現在文字上，更通過某些特殊行為傳達出來，例如抵制北方的語言、服飾，堅持南宋舊俗。在中國文化傳統裡，「衣冠」一直是華夏族群與周邊的區別特徵，具有特殊的象徵意義。面對北族服飾在江南的流行，汪元量作詩說：「世變長椎髻，時更短後衣。魏庭翁仲泣，唐殿子孫非。」¹⁰³詩中雖未明言，但「椎髻」一詞抒發的無疑是「華變於夷」的感慨。國變後鄭思肖攬鏡自鑑，云「所喜不靴笠，巍冠敝履行」，¹⁰⁴以堅持南宋衣冠、不從北族風尚為

⁹⁸ 林景熙，《林景熙集補注》卷四，〈辨說〉，頁396。

⁹⁹ 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一六，〈隆山牟先生文集序〉，頁6a。

¹⁰⁰ 牟巘，〈陳肖梅先生遺文序〉，王繼宗，《《永樂大典·常州府》清抄本校注》卷一七，頁1108。按，陳肖梅即陳炤（?-1276），戰死於常州，《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四五〇有傳。此文是牟巘為紀念陳氏而作。值得玩味的是，牟氏《陵陽集》二十四卷，元代即已刊行，卻未收入此文；今日所傳《陵陽集》各版本，亦不見以「胡」、「虜」稱呼元軍者。各版本間的文字對勘，參見李修生，《全元文》第7冊校記。

¹⁰¹ 鄧光薦，〈文信國公墓誌銘〉，曾棗莊，《全宋文》第356冊，頁420。《全宋文》本處錄文，係依據江西省博物館藏文氏墓誌拓片。

¹⁰² 劉詵，〈題危大樸與鄧子明書後〉，李修生，《全元文》第22冊，頁73。鄧氏的史著均已不傳，參看熊燕軍，〈鄧光薦史學著述雜考〉，《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35（2018）：53-60。

¹⁰³ 汪元量，〈感懷〉，楊鐮主編，《全元詩》（北京：中華書局，2013），第12冊，頁8。

¹⁰⁴ 鄭思肖，《鄭思肖集·心史》，〈覽鏡〉，頁78。

張佳

榮，¹⁰⁵慶幸時局變幻、年亦漸老，但故國之心猶堅。江西遺民蕭立之（1203-?）有感於時俗的變化，作詩云：

東南文物古遺餘，不料冠紳忽棄如。門外逢人作胡跪，官中投牒見番書。¹⁰⁶北式跪拜稱為「胡跪」，蒙古文字不稱「國書」而稱「番書」，道出了作者的拒斥態度。鄞縣人陳著（1214-1297）入元後為文「以甲子紀年，隱寓不臣之意」。¹⁰⁷至元三十一年，陳氏見到一套宋代鹵簿圖，覽畢感情複雜：

《景德圖》、《天聖記》久不在目，今忽而有此本，不暇較其詳略，而恍然如復見漢官威儀，當何如其感慨！甲午（1294）季夏望日，嵩溪遺老陳某書。¹⁰⁸在陳著眼中，宋代的衣冠儀仗代表了漢家威儀，反言之，新朝的文化並不被視作「漢家」的代表。

堅持故宋衣冠這一做法，在元代一些士人當中延續了很久。分宜人歐陽涇（1241-1335），「生平被前代衣冠，未嘗少易華靡，子孫不能強之」。¹⁰⁹當「宋之遺俗，銷且盡矣」之時，金華人俞金（1253-1324），「獨率其家以禮，深衣峨冠、談說古道」。¹¹⁰撫州人李士華（1266-1351）也以「我故國之人也」為由，堅持深衣幅巾，拒絕更換時裝。¹¹¹天台人盧中（1327-1390）「生元世中，世俗淪為胡夷」，卻「長衣危帽，徐言雅步，操儒生禮不變」。¹¹²值得玩味的是，上述俞金、李士華、盧中等，都是成長於元代的下層士人，他們卻拒絕遵從北族風俗而執著於南宋舊制，這一舉動背後，都有族群意識作為支撐。

¹⁰⁵ 關於「椎髻」、「靴笠」、「胡跪」等元代服飾與禮儀的北族文化意味，參看張佳，〈「深簷胡帽」：一種女真帽式盛衰變異背後的族群與文化變遷〉，《故宮博物院院刊》2019.1：21-39；張佳，《新天下之化：明初禮俗改革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頁66-68, 203-205。

¹⁰⁶ 蕭立之，《蕭冰崖詩集拾遺》（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32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明弘治刻本影印），卷下，〈寄羅澗谷〉，頁59下。

¹⁰⁷ 參看馬德富，〈陳氏小傳〉，曾棗莊，《全宋文》第350冊，頁111。

¹⁰⁸ 陳著，〈書鹵簿小圖後〉，曾棗莊，《全宋文》第351冊，頁44。

¹⁰⁹ 歐陽玄，《圭齋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第242冊，據明成化刊本影印），卷一〇，〈元故旌表高年耆德山村先生歐陽公墓誌銘〉，頁11上。宋代服飾與元代的差異，不在於「華靡」與否，而在於各自背後代表了不同的族群文化。這是身為元朝高級文官的歐陽玄不便明言的。

¹¹⁰ 王禕，《王忠文公文集》（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98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版權頁無出版年，據明刊本影印），卷二四，〈時齋先生俞公墓表〉，頁433下。

¹¹¹ 宋濂，《宋濂全集》卷六九，〈北麓處士李府君墓銘〉，頁1647。

¹¹² 方孝孺撰，徐光大點校，《遜志齋集》（寧波：寧波出版社，2000），卷二二，〈盧處士墓銘〉，頁730-731。

相對於統一中國南北僅有九十二年的元朝而言，宋遺民的影響似乎特別深遠。虞集（1272-1348）稱，在其家鄉江西臨川，「宋亡，故進士數人，衣冠偉儒（如），為眾庶儀表，三四十年而後盡」。¹¹³ 受他們影響而在新朝成長起來的第二代「文化遺民」，並不鮮見。¹¹⁴ 例如，婺源人汪炎昶（1261-1338），受學於宋遺民孫嵩，並與遺民許月卿的門人交往緊密。汪氏自號「古逸民」，終生以宋人自居。其墓誌稱：

時元有天下已久，宋之遺俗變且盡矣，而先生衣冠動作、語言禮度，猶宋人也。後生小子去宋日遠，無從徵之，見先生咸以為前代之遺賢，而先生亦曰：吾古逸民也。¹¹⁵

與宋亡時已近成年的汪氏相比，天台人潘音（1270-1355）是一個更為典型的例子。南宋流亡朝廷覆亡時，潘音還是一個不到十歲的兒童，然而長大後「見長老談崖山事，即潸然下淚，有亡國之恥」。¹¹⁶ 因此潘氏「雖長養元世而心猶為宋，凡所服用器食，皆不從胡俗」。¹¹⁷ 從殘留下的詩文來看，潘音的確是一位生長於元代、卻因格於夷夏觀念而拒絕認同元朝的「文化遺民」。潘音曾問學於大儒吳澄（1249-1333），但他對吳澄後來接受元朝徵聘非常不滿，〈遠遊〉詩謂：

方從草廬公（按，吳澄），共究鵝湖旨……奈何執德偏，一聘翩然起。《春秋》嚴內外，乾坤定冠履。西蜀已空亭，箕山仍洗耳。¹¹⁸

¹¹³ 虞集，《道園學古錄》（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第236冊，據明景泰刊本影印），卷四三，〈臨川隱士孫君履常甫墓誌銘〉，頁1a。

¹¹⁴ 除了下文討論的汪炎昶、潘音、張子昭等人外，以居家講授為生、官府屢聘不起的臨川人孫輒（1262-1334，見前揭虞集，〈臨川隱士孫君履常甫墓誌銘〉），幼年「師宋進士」、後與孫輒同入《元史·隱逸傳》的江西人何中（詳後文），都是類似的例子。

¹¹⁵ 宋濂，〈宋古逸汪先生墓誌銘〉，汪炎昶，《古逸民先生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32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清抄本影印），附錄，頁650下。

¹¹⁶ 潘日升，〈刻待清軒遺稿跋〉，潘音，《待清軒遺稿》（收入《宋集珍本叢刊》第88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據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影印，原書無卷數、頁碼），頁98。上海圖書館亦藏有一抄本《待清軒遺稿》，內容與國圖本無異。《四庫全書總目》曾著錄單行本《待清遺稿》，稱「詞氣頗涉粗率，未知果音之手跡否也」，僅列入存目，參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一七四，頁1544上。四庫館臣應該注意到了潘氏集中與眾不同的夷夏聲調，而列入疑偽，正是館臣對付此類違礙文獻的辦法之一（其典型例證，是對鄭思肖《心史》的「辨偽」）。有意思的是，潘氏別集題為「宋處士待清先生潘音著」，故此被誤當作宋人著作收入《兩宋名賢小集》，並跟隨該書一併收入《四庫全書》。雖然館臣對此未加察覺，但書中的敏感篇目，已全遭刪除。

¹¹⁷ 徐雲卿，〈宋處士待清潘先生遺稿序〉，潘音，《待清軒遺稿》卷首，頁83。

¹¹⁸ 潘音，《待清軒遺稿》，〈遠遊〉，頁84。

張佳

潘音認為吳澄出仕元朝，打破了夷夏內外之防，有違《春秋》之旨。揚雄獻賦求官、許由洗耳讓國，因為出處不同，他與吳澄分道揚鑣。〈登樓秋望〉謂所見「萬里胡塵連大漠，一樽漢月醉高秋」，漢時之月未變，而國土已沾染「萬里胡塵」；〈社日〉稱「自古厭胡塵，從無遍天壤。斗酒桑柘斜，何處同君享」，意謂「胡塵」遍滿、無處容身，與鄭思肖、許月卿同慨。¹¹⁹ 潘音成年之時，江南社會已經平穩安定，然而他卻將居所命名為「待清軒」。潘氏〈待清軒〉自述其意云：

（前略）況茲黃袍破，我生當其辰。衣冠歸左衽，海國陷黃塵。寧有人間世，能逃率土濱。……寤寐祇思晉，幽沉迴避秦。何時啟昌運，中國產聖人。願言同二老，荷杖還歸仁。¹²⁰

宋朝發端於陳橋兵變、黃袍加身，「黃袍破」意謂宋亡；「思晉」係借用陶淵明的典故，實指作者不忘故宋。「衣冠歸左衽」，也即南方華夏地區被左衽之「夷狄」征服。潘氏的詩裡也感慨當世之儒「用夏變於夷」，不能撥亂反正，空有「王佐」之名。¹²¹ 他要等待「中國產聖人」，也即期待有漢人推翻蒙古統治，實現再次的夷夏反轉。他的期待沒有完全落空。潘音以八十六歲的高齡，卒於至正十五年（1355），其年韓林兒以「宋徽宗九世嫡孫」之名稱帝，朱元璋渡江圍攻建康，江南震動，¹²² 而在此之前數年，方國珍已橫行浙南。在死之前，據說他已經聽聞「四方兵起，冀得真主一出，以卒其變夷之志」。¹²³ 潘氏後人所輯《待清軒讀書錄存遺》最末條云：

自古帝王皆起西北，至於胡元，數極矣。楚威時便言金陵有天子氣，自此東南當產聖人，以恢復寰宇，氣運循環使然也。吾何幸，得身親見之哉！¹²⁴

如果這條材料未經後人補葺增飾，在筆者所閱讀的文獻中，潘音是較早徑稱元朝為「胡元」的人。¹²⁵ 潘氏文集元代並未刊刻，正德時後人得舊稿兩大卷，「首尾

¹¹⁹ 潘音，《待清軒遺稿》，〈登樓秋望〉、〈社日〉，頁 87-88。

¹²⁰ 潘音，《待清軒遺稿》，〈待清軒〉，頁 84。本詩亦收入清人顧嗣立輯《元詩選》，畫線句諱作「衣冠歸□□，海國陷黃塵」、「何時啟昌運，□□產聖人」，見顧嗣立輯，《元詩選》初集（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 1969。

¹²¹ 潘音，《待清軒遺稿》，〈感詠〉，頁 88。

¹²² 參看俞本撰，李新峰箋證，《紀事錄箋證》（北京：中華書局，2015），「至正十五年」條，頁 31-44。

¹²³ 戴沈，〈宋處士待清先生傳〉（永樂九年撰），潘音，《待清軒遺稿》，頁 95。

¹²⁴ 潘音，《待清軒讀書錄存遺》（收入氏著，《待清軒遺稿》），頁 94。

¹²⁵ 上海圖書館藏《仙華方氏宗譜》附錄之《存雅堂遺集》，收有宋遺民方鳳的〈述志〉詩，云：「只因生在胡元世，豈將藍縷換羅衣」。此詩不見於清初重輯刊刻本《存雅堂遺稿》。族譜

蠹齧，皆不可讀，其幸可讀者，直百中一二耳」，最終釐定為詩集和讀書錄各一卷。¹²⁶ 潘氏文稿因未曾刊行以致蠹蝕散佚，固然是不幸；但若在元代刊行，上述不合時宜的詩文必定會被剔除，其思想也將無由表現。這並非是杞人之憂，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兩宋名賢小集·待清軒遺稿》當中，該書序跋以及〈遠遊〉、〈社日〉、〈待清軒〉、〈感詠〉等抒發故國之思與夷夏情感的詩作，便被悉數刪去，¹²⁷ 潘音連作為「宋遺民」的形象都模糊不清了。

元代南方士人、尤其是下層士人當中，流行一種懷戀宋朝的風氣，潘音並不是孤例。畢竟潘音幼年經歷過王朝更迭，而吳人張子昭（1293-1356）是徹底的元人，卻極端迷戀宋代的文物制度。鄭元祐（1292-1364）至正十六年為他所作的墓誌說，張子昭成年時，宋亡已三十年，但他熱衷於向「故老遺黎、殘校退卒」探問前朝遺事：

朝廷宗廟、宮室制度、會同燕享、生殺拜除、車輿服章、征屯討伐、文辭經術，下至幽人遁士言論出處，雖不能盡得其詳，然依約十一於千百。¹²⁸

南宋舊都杭州，張子昭「歲必一往或再往」，「每遊息登眺，必徘徊踟躕、籲嘆感嗟，哀不能已」。鄭元祐感慨雖然生長於元代，子昭之懷戀南宋，一如「周之頑有懷於商」，可謂宋之「義民」。他感嘆說「子昭之心，尤為隱約難見」，¹²⁹ 張子昭對宋代文物的極端眷戀，無疑折射了他對現實的強烈不滿；鄭氏所謂子昭之心「隱約難見」，其實是因忌諱而難言。這些在元朝成長起來的士人，他們對於南宋並不需擔負「忠誠」這一道德責任；「懷宋」風氣，本質反映的是盛元時代南方士人無法公開言說的族群意識。

除去前代遺民的影響，元代南方士人夷夏觀念的滋生，更來自現實的刺激，即

文獻往往來源複雜，姑存以備考。將元朝稱作「胡元」、顯示其為與「中國」不同的異族他者，是明代文獻的慣例。在筆者所閱讀的史料當中，朱元璋的幕僚較早使用「胡元」一詞。至正十六年朱元璋攻克金陵，致書禮聘當地名儒陳遇，朱元璋自述其起兵背景為「胡元入馭，海宇瓜分，豪傑興兵，共爭疆域」，意謂元朝以胡人的身分統治中國，導致人心思變。見陳鏞，〈陳靜誠先生遇傳〉，焦竑，《國朝獻徵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53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明萬曆刊本影印），卷一一六，頁552上。

¹²⁶ 徐雲卿，〈宋處士待清潘先生遺稿序〉，潘音，《待清軒遺稿》，頁83；潘日升，〈刻待清軒遺稿跋〉，潘音，《待清軒遺稿》，頁98。

¹²⁷ 潘音，《兩宋名賢小集·待清軒遺稿》（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64冊）。

¹²⁸ 鄭元祐，《僑吳集》（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95冊，據明弘治刊本影印），卷一二，〈張子昭墓誌銘〉，頁829下。

¹²⁹ 鄭元祐，《僑吳集》卷一二，〈張子昭墓誌銘〉，頁829下-830上。

張佳

征服者對南方日益深重的經濟掠奪與政治壓制。這讓統治族群與被征服者之間的界限，無法完全消解，無法真正實現徹底的族群融合。尚未引起學界充分重視的是，在「江南重賦」的歷史演進過程中，元代其實是一個極為關鍵環節。元代主要依靠江南財賦，維持國家運轉。征服之初，元朝政府便確立了「取償於南方」¹³⁰的經濟政策。南方民眾負擔激增，時人吳澄云：

至元丙子（1276）以後，（江南）民駭新令，疇昔高閭鉅室，不數年間淪為中下戶者比比，甚則破滅、靡有孑遺。¹³¹

類似的記載，在元初文獻中比比皆是。在江南核心地區湖州，「自陵谷變遷，田賦皆增糧倍稅，有產之家急於脫去」，¹³²出現了富戶因稅重而拋售田地的現象。元初對外擴張結束之後，情形並沒有好轉，政府對南方的經濟依賴反而越來越深。到元代後期，國家「經費所入，江浙獨當其十之九，歲給饋餉二百五十餘萬」。¹³³宋禧（1312-?）對元代江南重賦的演變過程，有清晰的描述。南宋紹熙（1190-1194）年間，松江秋糧十一萬石有奇，此後日增：

（宋季）有公田之役，而賦以增。國初（按，至元時）理土田，增於宋賦。延祐（1314-1320）間，復理而增之。前後以罪人家田沒於官，其賦又再增之。蓋今（按，至正時）七倍於紹熙者矣，民其困乎！¹³⁴

至正初年松江地區的賦稅，較南宋中葉增加七倍之多。這在江南並非個案，常熟租賦「宋時七八萬」，元末增至三十餘萬，較宋代加重四倍。¹³⁵常州路秋糧，宋末

¹³⁰ 元初江南行省左丞董士選，解釋當時的江南政策說：「國家竭中原之力以平宋，不得不取償於南方。」見吳澄，《吳文正公集》（收入《元人文集珍本叢刊》第3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據明成化刊本影印），卷三二，〈元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趙國董忠宣公神道碑〉，頁542下。忽必烈對外擴張期間對南方的經濟壓力，參看黃清連，〈元初江南的叛亂（1276-1294）〉，頁45-48。

¹³¹ 吳澄，《吳文正公集》（收入《元人文集珍本叢刊》第4冊），卷四一，〈故靜樂逸士黃君墓誌銘〉，頁12下。

¹³² 陳存，〈湖州路報恩光孝禪寺置田山記〉，李修生，《全元文》第19冊，頁595-596。

¹³³ 朱德潤，《存復齋續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32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涵芬樓秘笈》本影印，不分卷），〈平江路問弭盜策〉，頁366上。引文出自元政府發布的策問題目。

¹³⁴ 宋禧，〈送宇文先生後序〉，李修生，《全元文》第51冊，頁506。關於文中提到的元初以及延祐年間對江南土地的經理，可以參看陳高華，〈元朝的土地登記和土地籍冊〉，氏著，《元史研究新論》（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頁31-39。

¹³⁵ 王賓，《光庵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8冊，據清抄本影印），卷一，〈送常熟縣丞林公序〉，頁203。

咸淳時約三十四萬，元大德九年（1305）增至四十六萬，泰定元年（1324）再增至近五十萬。¹³⁶ 無錫秋糧宋時不到四萬石，延祐經理後增至十九萬。¹³⁷ 江南民眾不堪重負，減稅的呼籲，元代後期即已出現。¹³⁸ 日益深重的經濟掠奪，必然引發南人的不滿。葉子奇總結元亡之故，即稱有元一代「王澤之施，少及於南；滲漉之恩，悉歸於北」，造成南方離心。元末起事的韓山童為爭取南方支持，即批評元朝的壓榨「貧極江南，富稱塞北」。¹³⁹ 與經濟上對江南的倚重形成巨大落差的是，元政府持續壓制南人的政治地位，拒絕向南人開放關鍵政治資源，刻意維持一種不平等的族群關係。關於這點，學界已有諸多研究，¹⁴⁰ 此不贅言。這種由於現實刺激而萌發的族群身分意識，在許多士人當中都有體現。

越人王冕（1287-1359）不僅是藝術家，也是有鮮明夷夏意識與政治關懷的士人。與南宋科舉之盛形成對比，元代後期雖然開科取士，但僅僅是一項政治點綴，南人錄取的機率極小。¹⁴¹ 王冕「屢應進士舉不中」，遂「買舟下東吳，渡大江」，開始四處遊歷。¹⁴² 在杭州，他看到南宋故宮傾頹，「行殿白日古燐飛」，不禁「無言淚如水」。¹⁴³ 王冕北遊，感慨「山河猶漢魏，風俗混羌夷」。¹⁴⁴ 他曾在大都停留，聯想起遼金興亡、胡來漢往的歷史，賦詩「書生慷慨何多恨，恨殺當年石敬瑭」，¹⁴⁵ 將遼金元北族王朝的迭次南侵，歸罪於石敬瑭（892-942）割棄幽雲。對

¹³⁶ 相關數據參看王繼宗，《《永樂大典·常州府》清抄本校注》卷四，頁171, 174, 176。關於元代的稅糧徵收，參看陳高華，〈元代稅糧制度初探〉，氏著，《元史研究論稿》（北京：中華書局，1991），頁1-20。

¹³⁷ 弘治《無錫縣志》（收入《南京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第46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2），卷六，頁195-196。

¹³⁸ 如鄭元祐，《僑吳集》卷一一，〈長洲縣達魯花赤元童君遺愛碑〉，頁810。

¹³⁹ 葉子奇，《草木子》（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三上，頁55。

¹⁴⁰ 參看蒙思明，《元代社會階級制度》，頁37-69；洪麗珠，〈元代鎮江路官員族群分析——江南統治文化的一個樣本〉，中國元史研究會編，李治安主編，《元史論叢》第10輯（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5），頁251-277。

¹⁴¹ 參看姚大力，〈元朝科舉制度的行廢及其社會背景〉，氏著，《蒙元制度與政治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頁262-269；蕭啟慶，《元代進士輯考》，頁28-30。

¹⁴² 宋濂，《宋濂全集》卷一九，〈王冕傳〉，頁372。

¹⁴³ 王冕，《竹齋詩集》（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110冊，據《邵武徐氏叢書》本影印），卷二，〈錢塘紀行〉，頁984。

¹⁴⁴ 王冕，《竹齋詩集》卷三，〈閏七月廿三夜記夢二詩〉，頁1018。「風俗混夷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竹齋集》作「風俗想軒義」（《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33冊，頁40下）。

¹⁴⁵ 王冕，《竹齋詩集》卷四，〈南城懷古〉，頁1038。《四庫全書》的編者，已經體察出本句寓含的激烈夷夏情感，將其諱改為「書生慷慨何多感，轉憶輪台漢武皇」，致使本詩意義全

張佳

嚮往「一道德、同風俗」的儒家士人來說，北遊所見的胡漢雜糅的習俗，給王冕深刻的刺激。他抱怨元世祖時代的名臣劉秉忠（1216-1274）「但能成事業，不解制綱常」，¹⁴⁶ 也就是劉秉忠不解「用夏變夷」，用儒家「綱常」改變蒙元制度和風俗。

作為南人被征服者，王冕時時感覺到政治和經濟上受到的壓迫。例如，他觀看描繪遞運物資情景的〈盤車圖〉，便大發感慨：

漢家封侯已消磨，秦時長城做胡路。天險不設南北通，風俗一混歸鴻蒙……

灤水城頭無首蒼，馬驢盡食江南粟……大車連屬小車侶，雪地冰天無險阻。

玉帛穀粟取不窮，誅求那信人民苦。……側身悵望常嗟呼，天子亦念東南隅。¹⁴⁷

在漢族王朝時代，依照天險而設的長城，被視作區隔華夷的界限。而元代長城失去了限隔南北的作用，成為往來的「胡路」。和元代許多文人不同，王冕完全沒有對「大一統」的自豪感，他把南北「風俗一混」，視作退歸混沌（「鴻蒙」，文明未開化的狀態）；言外之意，是他更嚮往內外有分的華夷秩序。出於南人的敏感，他看到這幅物資轉運圖，立即想到塞外馬驢所食盡是「江南粟」，呼籲當局顧念東南民生之苦。¹⁴⁸ 一三三八年寫作的〈花驢兒〉，更假借雜戲，諷刺色目人在江南擅作威福：

花驢兒，渡江踏遍江南土。正值江南無馬時，驢兒得志雄威武，況是能解花

門語……百姓吞聲忍飢苦，驢兒啖粟恬如故……花驢兒，乃奇遇，昨朝方上

評事廳，今日又登宰相府，哮吼縱橫誰敢侮！老夫平生不信怪，見此怪事欲

嘔吐。歸來十日不食飯，扼腕攢眉淚如雨。¹⁴⁹

詩中所謂「花門語」，當指回鶻（畏兀）語，或泛指西域色目人群語言。元代色目人是蒙古人的政治盟友，二者合力對漢人進行統治。詩中隨意出入「評事廳」與「宰相府」的花驢兒，是對色目人權勢的暗喻；而詩中「江南無馬、驢兒得志」，意謂正因南人受到壓制，才使得色目人掌握權力。〈獼猴舞〉一詩，更以猴戲為言，表達對「非我類」者的排斥：

非（見王冕，《竹齋集》卷上，頁18下）。四庫館臣稱王冕「行多詭激，頗近於狂」（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九，頁1476下），對其詩文頗為留意，詩中「胡兒」、「胡塵」、「胡路」，乃至「漢官」、「衣冠」等稍涉敏感的詞彙，均被改竄。參看王冕著，壽勤澤點校，《王冕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所附校記。

¹⁴⁶ 王冕，《竹齋詩集》卷三，〈慶壽寺〉，頁1017。

¹⁴⁷ 王冕，《竹齋詩集》卷二，〈盤車圖〉，頁1004。

¹⁴⁸ 王冕，《竹齋詩集》卷二，〈盤車圖〉，頁1004。

¹⁴⁹ 王冕，《竹齋詩集》卷二，〈花驢兒〉，頁987。

獼猴本獸屬，野性殊不常。俄然脫穢垢，冠蓋儒衣裳……終然非我類，教養徒自傷。不如奪衣巾，棄置山野旁。¹⁵⁰

蒙古色目族群進入中原之後，不可避免地受到漢文化的影響，甚至產生出相當數量的士人群體。¹⁵¹但在某些漢族士人眼中，蒙古色目族群始終屬於文化上的「異類」，不可與之溝通。元末溧陽人孔克齊稱，其父生前「誓不以女嫁異俗之類」，把與外族通婚看作是「辱百世之祖宗」，原因是「異類非人性所能度之」，態度不可謂不激烈。而孔克齊本人也表示，「世俗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果信然」，¹⁵²足見和蒙古色目族群在文化和心理上的隔閡之深。王冕雖然用詩歌暗喻的形式，但其對「異類」的排拒，同樣激烈。從這裡也便可以理解，後來打著「復宋」旗號的朱元璋進攻紹興，王冕主動為之出謀劃策，其實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¹⁵³

（二）典故與比喻：族群觀念的隱性表達

王冕在元代被視為「狂士」，以不拘言行而著稱。然而正如在〈花驢兒〉、〈獼猴舞〉等詩中所看到的，王冕的族群意識與夷夏情節，卻是通過隱喻的方式，曲折而非直接地表達出來的。在他的文字當中，我們找不到公開直白指斥統治族群的例子。出於環境壓力，元代南人的族群觀念，大多採用類似的隱性表達，借用各種典故與比喻將自己包裹起來，以免直接觸犯忌諱。

現存江西人何中（1264-1332）的文集當中，¹⁵⁴竄入了後至元戊寅年（1338）

¹⁵⁰ 王冕，《竹齋詩集》卷一，〈獼猴舞〉，頁977。

¹⁵¹ 參看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蕭啟慶，《九州四海風雅同：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形成與發展》（臺北：聯經，2012）。

¹⁵² 孔克齊，《靜齋至正直記》，「不嫁異俗」條，頁344-345。

¹⁵³ 王冕是否曾入朱元璋幕府，野史記載多有分歧。元末張士誠幕僚徐勉之作《保越錄》，稱朱軍劫掠紹興城郊，王冕獨不入城躲避，「自言善韜略兵機，得以不死」，朱軍攻打紹興曾「用王冕之計」，見徐勉之，《保越錄》（收入《叢書集成初編》，據十萬卷樓叢書本排印），頁11。這則記錄出自時人之手，最為可信。

¹⁵⁴ 何中也是一位有意思的人物。他的父親和伯父曾與文天祥一道起兵，事敗後其父多年隱匿，伯父則變姓名為道士。何中幼年「師宋進士張叔方、朱光甫、羅士鼎」，在公開話語裡他可以頌揚元朝「列聖繼治，際天所覆，仁義漸摩，民俗於變」，然而回到私人語境，卻無法忘懷父輩曾經「與虜屢死戰」的家族歷史。他認為「苟遇知己」，可以「不擇胡越」，羨慕前秦王猛「紬身扶世，用夏變夷」，但其一生都未有機會。以上分見〈知非堂稿序〉、〈節婦劉母歐陽氏事狀敘〉、〈與羅滄州書〉，何中，《知非堂稿》（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

張佳

某位南士寫作的〈學前潘氏族譜序〉，¹⁵⁵這是一份有意思的文獻。〈譜序〉把當地的現狀，與宋末的情形進行了比較：

予聞長老言，宋之季年，故家大族屋宇之華、田疇之廣、廩庾之積，五橋之花竹、洛陽之園亭、金谷之燕遊、梁國之賦咏，蓋兼有之。一旦颶回霧塞、雪虐風號，泯爾遺基、寂然行跡，惟見妖狐怪螭，嘯呼出沒於荒墟殘照之間矣。

愚近貴而已。及夫黃丁茁壯化為葛藟，聳於禮、瞽於義，以悖為適。楚黑之橐甲、駟豐之相伐，叔遺室孔氏之姑，季肥戕南孺之□，其事之甚戾，變之可駭，族譜引〈思亭記〉之所言，不足以形容其髣髴。¹⁵⁶

這段文字情感激烈，但又層層用典，意思晦澀。前半段感慨入元後（「颶回霧塞、雪虐風號」）本地故家凋零、繁華不再。這類內容在元代文獻裡並不鮮見，¹⁵⁷由此而生的被掠奪感，也是南方士人普遍的感受。後一部分則借用大量典故，批評統治者在倫理道德上與儒家傳統的衝突，以及由此導致的社會風氣變化。「楚黑之橐甲、駟豐之相伐，叔遺室孔氏之姑，季肥戕南孺之□（疑『子』）」，一氣連用了《左傳》的四個典故，分別指鄭國公孫楚、公孫黑堂兄弟因爭妻而互鬥，貴族駟氏、豐氏同母兄弟相攻，衛國叔遺繼娶嫂氏孔姑，以及魯國季康子殺害幼弟篡奪

叢刊》第94冊，據清抄本影印），卷首，頁416；卷一一，頁539；卷八，頁513。與何中類似的，是金華人葉顥（1300-1374年後）。葉顥是元朝成長起來的詩人，對元廷並無特別的惡感，然而在某些情形下，依然會想起「華夷之辨」等主題。例如他在山村中看到用來糊窗的德祐年間邊防策稿，便感慨「國亡留得邊防策，猶向窗前戰北風」；對宋末秉國者「弄權賣國，甘心降虜」憤恨不已。以上參看葉顥，《樵雲獨唱詩集》（《續金華叢書》本，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藏），卷五，頁13a, 28a。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樵雲獨唱》無此二詩（《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19冊）。

¹⁵⁵ 佚名，〈學前潘氏族譜序〉，何中，《知非堂稿》卷九，頁526-527。根據何氏行狀和墓誌，可以確知其卒於至順壬申（1332）。因此這篇寫作於至元戊寅（1338）的文字，肯定不出何氏手筆。

¹⁵⁶ 佚名，〈學前潘氏族譜序〉，何中，《知非堂稿》卷九，頁526-527。

¹⁵⁷ 如柳貫稱，「江南內附，官府新立，州境屢騷，故家巨室困於徵求之促數，逼於盜賊之侵凌，傾資破產，易若轉掌」，參柳貫，〈元故封從仕郎溫州路樂清縣尹黃公行狀〉，李修生，《全元文》第25冊，頁345。元人俞庸稱，「余觀朔南混一之際，兵戈騷屑，黔首死徙過半。平定以來四十年餘，故家鉅室，陵替銷落，十存一二」，見俞庸，〈高資橋記〉，李修生，《全元文》第28冊，頁316。此類關於宋元易代後經濟凋弊、故家衰落的記述甚多，此不贅舉。

家主。¹⁵⁸ 這些貴戚之間爭妻奪位的典故，實際在暗諷蒙元歷史上屢屢上演的兄弟爭位鬥爭，以及因蒙古統治而盛行的收繼婚俗。這類與儒家倫理激烈衝突的現象，是許多士人無法接受的「可駭」之變。¹⁵⁹ 因為環境所迫，這位作者只能借助層層典故，激烈而隱晦地批評。有意思的是，同樣角度的批評，後來直接出現在明初的〈論中原檄〉裡：

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斃兄。至於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為怪。其於夫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瀆亂甚矣！¹⁶⁰

檄文大張旗鼓的撻伐，與元代佚名作者的隱晦批評，在實質內容上並無二致，都是攻擊蒙元違背儒家倫理，「污染」中國。雖然〈譜序〉通篇沒有出現「華夷胡漢」等詞語，但其文化立場與〈論中原檄〉是一樣的；二者文辭上的顯隱之別，只因時局處境的差異。

元代文獻關於族群觀念、族群矛盾的表述，許多都是隱性的，像上文那樣，用各種隱喻和典故傳達出來，如果缺乏相應的文化背景，很難理解其中的真實含義。這裡可以再舉一組有趣的例子。在元代的詠物詩當中，詠「雁」者為數不少，其中有許多是在表達對北人的態度。大雁生於北方，天寒無食時飛往南方越冬求活，在很多南人看來，這正像原居北方卻南下生活的蒙古色目人。鄭思肖說「韃人絕望江南如在天上」，「謀居江南之人，貿貿然來」。¹⁶¹ 於是「雁」在元詩當中，便成為一個特別的意象。鄭思肖即將蒙元攻宋，比作「雁犯南天」。¹⁶² 揭傒斯（1274-1344，江西豐城人）有一首流傳頗廣的〈題雁圖〉詩云：「寒向江南暖，飢向江南飽，物物是江南，不道江南好」，元人孔克齊解釋揭氏之意說：

¹⁵⁸ 分見《春秋左傳正義》（收入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卷四一（昭公元年），頁2022上-中；卷四〇（襄公三十年），頁2012下；卷五八（哀公十一年），頁2167中；卷五七（哀公三年），頁2158上。

¹⁵⁹ 參看張佳，〈再敘彝倫：洪武時期的婚喪禮俗改革〉，《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4.1（2013）：91-93。

¹⁶⁰ 《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卷二六，頁402。

¹⁶¹ 鄭思肖，《鄭思肖集》，〈大義略敘〉，頁187。

¹⁶² 鄭思肖，《鄭思肖集》，〈遣興二首〉，頁50。

張佳

（此詩）蓋譏色目、北人之來江南者，貧可富、無可有，而猶毀辱江南不絕，自以為右族身貴，視南方如奴隸。然南人亦視北人加輕一等，所以往往有此誚。¹⁶³

元朝只知攫取江南財富，卻不給予南人政治地位的政策，引起南方士人不滿，本詩便是這種不滿情緒的反映。如果沒有時人孔克齊的這番解釋、或者不了解元代的文化語境，大概不會有人從族群矛盾的角度解讀本詩，更不會知道曾經身為元朝高級文官的揭傒斯，會對統治者有如此的看法。

「雁」在儒家文化傳統中，是一種具有忠貞守禮、知時有序等多種美德的飛禽，¹⁶⁴ 因此在士大夫相見、婚禮等禮儀活動中，均以雁作為禮物，古人的詠雁詩，也多集中於對上述品行的讚美。然而，元代許多詠雁詩，關注點卻在其南方謀食、久客不歸上。此類詩歌大多別有寄託，隱含了將南下的蒙古色目人視作客人之意。清人吳榮光（1773-1843）《辛丑銷夏記》，著錄了宋人袁立儒〈蘆雁卷〉後面的一組元人跋詩，為我們揭示了更多南士對統治族群的隱微看法。這組詩共計二十四首，作者都是江南的文人和僧侶。清代學者翁方綱（1733-1818）因「諸家題句多風塵亂離語」，考訂這組詩中的「癸巳」紀年，是至正十三年（1353）。¹⁶⁵ 根據元代文化語境中「雁」的隱喻，可知這組詩中許多篇章都是在抒發對蒙古色目人壓榨南方的不滿，嘲弄他們元末在江南的窘境。其中永嘉人曹睿之詩最為顯白：

胡雁畏北風，秋高向南飛……紛然散洲渚，飲啄日以肥。寧知江南人，終歲常苦飢！¹⁶⁶

大雁生於北地，因此詩中稱之為「胡雁」。它們從蕭條的北方來到富庶的江南，散布洲渚、飲食日肥，而江南本地人卻忍受飢苦。通過這一對比，詩歌的意旨不言而喻。本組其他跋詩，亦謂大雁在江南飽食，「歲晚何憂身不肥」、「羽毛鮮好身肥健」，¹⁶⁷ 皆是在諷刺異族統治者之貪求無厭。這組詩歌寫作時，元末大亂已經揭開序幕，元朝的江南統治開始動搖，此時割據浙東的方國珍更是「深忌色目

¹⁶³ 孔克齊，《靜齋至正直記》，頁388。本詩在元末流傳較廣，元人楊瑀所記略有差異，後兩句作「莫道江南惡，需道江南好」，參楊瑀，《山居新語》（北京：中華書局，2006），卷二，頁217。

¹⁶⁴ 參看陳立，《白虎通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94），卷一〇，頁457。

¹⁶⁵ 翁方綱跋文，見吳榮光，《辛丑銷夏記》（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2），卷二，頁110。

¹⁶⁶ 曹睿跋詩，見吳榮光，《辛丑銷夏記》卷二，頁110。

¹⁶⁷ 釋元鼎、釋天泉跋詩，見吳榮光，《辛丑銷夏記》卷二，頁109。

人」。¹⁶⁸ 因此這組詩中出現大量描述江南凶險、勸說大雁北歸的語句，諸如「羅網遍天地」、「早賦歸去休」，「江南是處多遊獵，只合高飛避網機」，「風塵滿地邊聲急，若個黃蘆枝葉長」等等，¹⁶⁹ 其中有對羈留江南的蒙古色目人處境的哀憐，但更有嘲弄。¹⁷⁰ 這組詩歌為探索元季江南的族群關係，提供了新的材料；¹⁷¹ 不過由於其表達的含蓄，必須要放在特定的文化與政治語境中才能解讀。而那種直白赤裸、毫無隱晦的夷夏論述，稍後即將在元末群雄的宣傳中湧現。

五·元季的「夷夏」語境與〈論中原檄〉的思想源流

元末的亂局，是元代積累的各類矛盾的總爆發。對於族群矛盾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當時人已有所分析。元末天變與民變交疊，徽州人姚瑛（1301-1368）推究其根源，認為是朝廷「區別種類」政策導致的民怨不伸，其在給元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董搏霄（?-1358）的上書中稱：

某以為國家之區別□□□□□□非也，即因一二倡亂者而盡疑□□□□為叛逆，亦非也。帝王者，天之子也；天者，群物之祖也。天固遍覆包含而無所殊，帝王法天以立道，亦遍覆包含而無所私……況為一統帝王而區別種類也乎？惟下方之氣有鬱而不伸，故上天之象因感而示變。¹⁷²

¹⁶⁸ 瞿佑，《歸田詩話》（收入喬光輝點校，《瞿佑全集校註》，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卷下，「梧竹軒」條，頁478。根據瞿佑的說法，色目詩人丁鶴年即因此「畏禍遷避無常居」。

¹⁶⁹ 以上分見釋德修、釋元本、葉亮跋詩，吳榮光，《辛丑銷夏記》卷二，頁105,107。此類語句跋詩中甚多，此處不贅引。

¹⁷⁰ 元末大亂中，平日高高在上的蒙古色目人，和普通人一樣遭受離亂之苦，對此不乏心懷喜幸者。江西人劉秩，詠嘆一位被擄後嫁給軍人的蒙古女子，謂其昔日「平生服用皆精奇，人間荆布那能知」，然而卻一朝被擄、嫁作軍婦，「昔日南人不敢娶，豈料今為時所棄」，頗帶譏諷之意。見劉秩，《聽雪篷先生詩集》（收入《明代詩文集珍本叢刊》第6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9），卷四，〈金罍罍〉，頁505。

¹⁷¹ 除了上文所引之例，還可見釋道衍，〈南雁詞〉，楊鐮，《全元詩》第58冊，頁389；張仲深，〈歸雁〉，楊鐮，《全元詩》第52冊，頁27-28。

¹⁷² 姚瑛，〈上參政董孟起十策·占天文〉，李修生，《全元文》第49冊，據周清澍先生藏乾隆刊本《雲山一懶翁集》錄文，頁45。姚瑛生平，參看楊訥，〈罕見的元人文集《鰲溪周先生文集》與《雲山一懶翁集》〉，氏著，《元史論集》（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2），頁428-429。楊訥先生推測此文作於至正十三、四年。文中前處闕文，或可補作「蒙古色目漢南人」，後處或可補為「漢人南人」。南京圖書館藏有丁丙鈔本《姚叔器先生集》，該集僅錄姚瑛詩作，未收此文。蒙古色目統治階層將元末民眾起事，看作漢人南人的群體性抗

張佳

他認為要廢棄此類族群不平等政策，「以萬民合為一心、以四海合為一家」，方能從根本上消弭禍亂。元末名臣余闕（1303-1358）亦稱元朝平定以來，「南人爭出仕，而少不達，則怨議其上而不可止」，由於政治資源分配不公，以致元末附亂者眾。¹⁷³

隨著蒙元政府權威的失落，原先民間蟄伏的夷夏觀念，開始公開湧現。從現存史料來看，除張士誠部尚不能確定外，朱元璋所屬的北系紅巾韓宋政權、南系紅巾徐宋政權（以及從中分化出的陳友諒漢政權、明玉珍夏政權），甚至在元朝和朱元璋之間的首鼠兩端的方國珍，都曾利用過夷夏宣傳鼓動民眾。¹⁷⁴

在這些宣傳當中，「復宋」也即興復宋統，是一個特別有影響力的口號。在南北方分別起事的徐壽輝和韓林兒，同時使用「宋」作為國號，¹⁷⁵可見其在元代社會潛具的影響力。這一口號並不是突然提出的，而是有深厚的社會文化土壤。前文已經提到，「懷宋」是盛元時代江南士人隱晦表達族群意識的一種方式；然而有意思的是，北方中原民眾的族群意識，也通過對宋朝的思念表達出來。《元典章》「亂言平民作歹」條，收錄了元武宗至大年間（1308-1311），因滹沱河改道而產生的一則民間謠言，是極為罕見地反映盛元時代北方民眾族群意識的史料：

如今真定府後河元曲呂來，直了也。漢兒皇帝出世也，趙官家來也，漢兒人一個也不殺，則殺達達、回回，殺底一個沒。¹⁷⁶

爭。《庚申外史》載紅巾事變聞於朝廷，「省吏抱牘題曰『謀反事』，至，脫脫前視其牘，改題曰『河南漢人謀反事』」，奏稱「方今河南漢人反，宜榜示天下，令一概剿捕；諸蒙古色目，因遷謫在外者，皆召還京師，勿令誑誤」。參權衡，《庚申外史》（收入《叢書集成初編》，據《學津討原》本排印），頁15-16。元亡於不公正的族群政策導致的民心背離，是當時許多人的共識。江西豐城人熊太古，謂元朝「其興也以本族之人，其亡也亦以本族之人，異姓之卿不得總庶政」，並記錄下統治階層仇視河南漢人的例子。見熊太古，《冀越集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16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清抄本影印），前卷，「遼金宋（元）相因」條，頁272。

¹⁷³ 余闕，〈合肥修城記〉，李修生，《全元文》第49冊，頁157。是文作於至正十三年（1353）。

¹⁷⁴ 參看張佳，〈元明之際「夷夏」論說舉隅〉，頁42-49。

¹⁷⁵ 關於徐壽輝所建政權之國號，參看楊訥，〈徐壽輝、陳友諒等事蹟發覆——劉尚賓文集讀後〉，《中華文史論叢》2008.2：71-94。

¹⁷⁶ 陳高華等點校，《元典章》（北京：中華書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卷四一，頁1402。這則讖謠產生的背景與涵義，參看劉海威，〈讖謠所見之「達達」、「回回」和「漢兒」——《元典章》「亂言平民作歹」條解讀〉，姚大力、劉迎勝主編，《清華元史》第4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頁54-59。

謠言中的「趙官家」，是民間對宋朝皇帝的俗稱。¹⁷⁷ 按照讖謠的說法，滹沱河改道預示著「漢兒皇帝」出世、趙宋王朝重建，並對壓迫他們的「達達、回回」進行報復。雖然這只是一則民間謠言，但其對元代族群政治的認識，卻相當到位——元代的確是蒙古與色目貴族聯合起來，對漢人進行統治。謠言所反映出來的北方民眾的族群反抗意識，不可謂不強烈。及至元末，彰德路天寧寺塔變色，河北童謠又有「塔兒黑，北人做主南人客；塔兒紅，朱衣人做主人公」之語，所謂「北人」即蒙古人，「南人」則指廣義的漢人。¹⁷⁸ 童謠隱約蘊含蒙古統治漢人為「主客易位」之意，也是族群矛盾在民間下層的反映。以往研究認為，族群意識只會產生於受過教育的士大夫階層，底層民眾不可能自發產生族群觀念，¹⁷⁹ 從上文史料看，這個觀點恐怕值得再思。這種族群對抗情緒一直潛伏在民間，到元末大亂時在「復宋」的旗號下，集中爆發出來。《元史》稱元季「河南諸處群盜，輒引亡宋故號，以為口實」。¹⁸⁰ 值得玩味的是，中原地區是由金、而非由宋入元的，然而民眾反元卻用「復宋」而不用「復金」的口號，目的顯然是要借助族群認同的力量，意在宣揚作為漢人政權的「宋」，比異族政權元朝，更有統治中原的合法性。¹⁸¹

從現有史料來看，元末群雄起事時的夷夏宣傳，大多出自中下層士人。這些缺乏「根腳」、出頭無望的中下層士人，是元代征服體制的直接受害者，儒家經典思想資源的啟發加上現實壓迫的刺激，很容易滋生族群對立情緒，並在元末特殊的時局下公開出來。朱元璋集團的第一批重要士人、一三五五年渡江之初「首率父老、

¹⁷⁷ 參看蔡美彪，〈《元朝秘史》與《史集》中的趙官〉，《中國史研究》2009.4：101-104。

¹⁷⁸ 《元史》卷五一，頁1103。關於民間讖謠的分析，以及元代普通民眾的族群觀念，參看蕭啟慶，〈中華福地，古月還家：蒙元興亡與讖緯〉，氏著，《元朝史新論》，頁83-97。

¹⁷⁹ 例如，宮崎市定便認為「本來民族主義就醞釀於知識分子之間……但元明之際的知識分子不屑於參加叛軍，不為新興力量所用，這就是元明革命中『攘夷』思想淡薄的原因之一」，參看宮崎市定，〈從洪武到永樂〉，頁1063。與民眾的情況相反，反映北方士人族群意識的材料非常稀少。筆者贊同「元代北方士人族群觀念淡薄」的推斷。這可以從元明之際的南方史料中得到印證。例如，明玉珍認為「驅逐元虜」乃是天意，但「中原人物，解此者少，尚為彼用，殊為可惡」，見楊學可，《明氏實錄》（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159冊，據《學海類編》本影印），頁9。

¹⁸⁰ 《元史》卷四二，頁900。

¹⁸¹ 關於元末「復宋」口號的族群含義，可以參看王崇武，〈明太祖與紅巾〉，周保明、吳平選編，《東方雜誌·學術編》（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第7冊，頁4343。

張佳

迎謁轅門」的太平人陶安 (1315-1368)¹⁸² 和李習，都屬於這類士人。明朝開國時的禮樂制作，基本出於陶安之手；¹⁸³ 陶安曾中元代鄉試，朱元璋回憶其來投奔的背景，稱「胡元疑吾漢、南，雖有道之士不居要職，俄遇朕渡江，慨然相副」。¹⁸⁴ 元代征服體制下的歧視政策，促成了陶安的反元。和陶安同時歸附的李習，亦「負經濟之才，以南人見擯斥」。李習著有《橄欖集》，書名取意為：

橄欖者，產於南而北方不食，野人食之，始惡其澀而終樂其甘，名集之意如此。¹⁸⁵

李氏以南方野人自居，身為南人而不得為北方蒙元政府所用的怨懟之情，可見一斑。至正二十二年 (1362) 向朱元璋進獻規取天下的「武事一綱三目」¹⁸⁶ 的天台人葉兌 (1307-1389)，也是一位屢試不第、「家無擔石之儲、親無菽水之養」的貧士。¹⁸⁷ 他自述此前在家鄉聽到朱部的復宋旗號，已深受觸動：

南方之人，久淪異俗，一旦聞閣下用夏變夷，挈還禮義之鄉，仰慕愛悅之私，又何如哉！¹⁸⁸

當時朱元璋勢力尚遠在建康，葉兌無法進謁。己亥年 (1359) 標舉「復宋」旗號的朱元璋親征婺州獲勝，當地士人曹志歡呼「遇亂逢真主，提兵淨婺城……犬羊潛遁跡，今日定昇平」；¹⁸⁹ 在此期間葉氏曾「冒暑奔謁」，不巧因朱元璋「旋騎建業」而未能相見。¹⁹⁰ 三年後朱元璋之甥李文忠出鎮浙南，尚在方國珍統治下的葉兌冒

¹⁸² 費宏，〈陶學士文集序〉，陶安，《陶學士先生文集》（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 97 冊，據明刊本影印），卷首，頁 2 上；《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一三六，〈陶安傳〉，頁 3925。

¹⁸³ 參看《明史》卷一三六，〈陶安傳〉，頁 3926。

¹⁸⁴ 朱元璋，〈祭江西參知政事陶安文〉（洪武元年九月），陶安，《陶學士先生文集》卷首，頁 26 下。

¹⁸⁵ 焦竑，《國朝獻徵錄》卷八三，〈太平知府李習傳〉，頁 413 上-下。

¹⁸⁶ 〈葉兌傳〉謂「後數歲，削平天下，規模次第略如兌言」，《明史》卷一三五，頁 3917。

¹⁸⁷ 葉兌，《四梅軒集》（收入《明別集叢刊》第 1 輯第 4 冊，黃山：黃山書社，2013，據一九四八年包費抄校本影印），〈上陳顯道書〉、〈與宋景濂學士書〉，頁 508 上-下。

¹⁸⁸ 葉兌，《四梅軒集》卷一，〈一綱三目上皇帝書〉（書中稱朱元璋為「國公」，標題為後人改擬），頁 501 上。此文又題為〈上太祖高皇帝武事一綱三目策〉，見謝鐸 (1435-1510) 輯，《赤城論諫錄》（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69 冊），卷七，頁 705 下-709 下。

¹⁸⁹ 曹志，《拱和詩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24 冊，據清抄本影印），〈玉師下發〉，頁 14。

¹⁹⁰ 以上背景見葉兌，《四梅軒集》，〈上浙江左丞李公書〉，頁 506 下。

險上書，並最終在李文忠引薦下輾轉到達金陵。誠如後人所言，「他上書的動機，是被濃厚的民族思想所促成」。¹⁹¹

葉兌此行的核心目的（也就是其所上「武事一綱三目」之「綱」），便是勸說朱元璋拒絕元朝軍閥察罕帖木兒（1328-1362，「李察罕」）的招降。其時察罕帖木兒平定山東紅巾，群雄震動，朱元璋亦遣使「通好」，¹⁹² 做首鼠兩端之態。在方國珍聯絡下，元朝試圖趁機誘降朱部。¹⁹³ 這是朱元璋部發展史上的一個關鍵點。葉兌認為，察罕帖木兒相當於漢末的曹操，雖然有挾持元帝的便利，但並不足懼：

今元以夷狄之種，僭據華夏。民厭腥羶，思得真主以洗其習，久矣。而李察罕上不知天命有歸，下不察民心之厭胡，亦欲效操之所為，跡雖同而實則異。

國公（按，朱元璋）欲用夏變夷，李氏變於夷者也，可乎？¹⁹⁴

葉兌認為漢末朝廷尚得民心，而元末已經「民心厭胡」，察罕雖然可以假借元帝旗號，但並不會因此獲得民眾支持。而和察罕相比，朱元璋最大的優勢，恰在於其「用夏變夷」旗號所顯示的種族與文化立場。葉氏認為，這一口號契合民意，最能收攏人心；只要策略得當，朱氏便可以進取天下，即便遇挫也不失為割據一方的孫權。

在元末群雄的謀臣當中，像葉兌這樣有鮮明族群意識的下層士人，並不是少數。¹⁹⁵ 徐壽輝、陳友諒的幕僚劉夏（1314-1370），元末長期流落袁州，「日課市井子弟」、「頽然伍於齊民」，¹⁹⁶ 也是一名不得志的下層士人。他對元末大亂的觀察，同樣站在種族主義的立場，認為：

（元末之亂）正以夷狄之運將滿百年。自古夷狄之君無百年之運，觀於天下，國虛無人、地大不治，天心廢之，其心見矣。

¹⁹¹ 包賚，〈校四梅軒集跋〉，葉兌，《四梅軒集》附錄，頁539下。在《明史》當中，完全無法發現上述思想背景，包氏謂「《明史》修成於清朝異民族統治之下，凡關於民族思想的，都被史官刪削了，這是抹殺了民族英雄的精神，非讀原書難以明了志士的心胸」。

¹⁹² 朱元璋通好察罕事，見《明太祖實錄》卷九，「辛丑年八月己卯」條，頁116-117。

¹⁹³ 元廷遣使招降一事，見張翥，〈方國璋神道碑銘〉，黃瑞輯，《台州金石錄》（《嘉業堂叢書》本，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藏），卷一三，頁29a。李新峰對此事的疏證，見俞本，《紀事錄箋證》，頁166。

¹⁹⁴ 葉兌，《四梅軒集》卷一，〈一綱三目上皇帝書〉，頁502上。

¹⁹⁵ 與葉兌類似，曾向朱元璋陳說「夷夏大義」的士人，至少還有朱升、葉子奇和陳遇等，此不具論。參看張佳，〈元明之際「夷夏」論說舉隅〉，頁42-49。

¹⁹⁶ 劉夏，《劉尚賓文續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32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明刊本影印），卷三，〈贊揚參政書〉，頁133。

張佳

依據宋代以來流傳的「胡虜無百年之運」的觀念，¹⁹⁷ 劉夏認為天運轉移，才是作為「夷狄」的元朝天下大亂的根本原因；而他所投身的徐宋紅巾政權倡言「夷夏大義」，是順應天運人心之舉：

（徐壽輝）遂倡皇宋之正統，掃夷狄之閭位。數之以君子在野小人在朝，數之以貪官污吏佈滿中外，數之以腥羶中土，數之以毀裂冠冕。

在他看來，上述種族立場才是徐宋政權「能乘上流之勢，鼓行而東趨」的關鍵。徐宋所面臨的最大對手，是各地自發的地主武裝（即「白軍」）。劉夏看來，當務之急是要「解紅白之仇」；而「解仇」的關鍵，在於喚醒民眾的夷夏意識：

（紅白之仇）解之之道宜如何？開誠心、布公道，修好問、通往來，諭告：尚紅者，吾宋之民也；尚白者，亦吾宋之民也。豈有宋民還殺宋民？……彼力既疲而中有慊，聞吾招之，必喜「得我」而解仇來歸。¹⁹⁸

劉夏認為紅白兩軍，可以在「宋民」這一個共同的身分認同下達成和解。在紅白和解的基礎上，再「審得時事」、「大舉北伐」。從這裡我們也可以看見前文所論述的「宋朝」認同，在民間所具備的持續而深遠的影響。

梳理元代夷夏觀念由隱到顯的思想歷程、還原元季的政治與文化語境之後，我們會發現洪武元年〈諭中原檄〉的出現，在元代的思想脈絡中其實並不突兀，是長期潛藏的思想暗流，在元末特殊政治環境下公開而集中的表達。

〈諭中原檄〉所展現的夷夏觀，有三個要點：(1)「元非我類」的族類分野，(2)「內夏外夷」的「合理」華夷秩序，(3) 天運循環的歷史觀。檄文正是以這三個邏輯前提為支撐，來構建明軍北伐的合法性、推導出元朝必亡的結論。然而，從前文的梳理可以知道，上述三點並非是明初才萌發的新思想，實是並無新意的老生常談。檄文的思想來源有兩個：遠源是儒家經典，尤其是經過宋人重申闡釋和構建的《春秋》之學；近源是元代作為思想暗流的各類夷夏論述。

〈諭中原檄〉首先指出，元朝是以「北狄」的身分入主中國，意圖從血統上與蒙元進行切割。然而，中國古代的族類劃分，血緣並不是最重要的憑據。所謂「諸侯用夷狄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¹⁹⁹ 文化才是劃分華夷最重要的標

¹⁹⁷ 關於這一觀念的產生與流布，方震華已有詳細研究。參看方震華，〈夷狄無百年之運——運數論與夷夏觀的分析〉，《臺大歷史學報》60 (2017)：159-191。

¹⁹⁸ 以上引文，均見劉夏，《劉尚賓文續集》卷三，〈戊戌五月擬上劉晉昭參議書〉，頁136上-下。

¹⁹⁹ 韓愈撰，劉真倫校注，《韓愈文集彙校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17），〈原道〉，頁3。關於韓愈此語的文本考辨，參看樊文禮，《儒家民族思想研究：先秦至隋唐》（濟南：齊魯書社，2011），頁217-220。

準。是否具有統治「中國」的合法性，統治者的血緣與居地並不重要，採用何種文化制度才是關鍵——這也即是元人郝經（1223-1275）的名論「能用士而能行中國之道，則中國之主也」。²⁰⁰ 這個標準，是元代許多士人的共識，由此產生了諸多值得玩味的文化現象。例如，他們毫不諱言蒙元起家不在中原而是龍興「朔漠」的事實，也不像中古邊裔那樣，急於尋找一個與漢人共同的祖先。因為血統，並不是阻礙構建蒙元統治合法性的關鍵。相應的，他們不惜誇大事實，極力稱頌元朝崇用儒學、遵行古制，藉此將元朝皇帝塑造造成儒家式的聖王。²⁰¹ 一個值得玩味的事例是，不通漢語、不識文字的忽必烈尚未即位，便被張德輝、元好問等一眾名儒，推戴為「儒教大宗師」。²⁰² 元人歐陽玄（1283-1357），對此事賦予了極高的意義：

世祖龍潛，諸儒請尚其號曰「儒教大宗師」。嗚呼！漢唐宋創業之主，烏得而有是號哉！此天以道統而屬之世祖也。²⁰³

通過這種讓人驚異的方式，忽必烈被納入「堯舜湯武」以來的道統脈絡，原本異質的蒙元歷史，得以嵌入以儒家文化為主導的中國歷史譜系。這些不可思議的舉動，反映的都是儒士們試圖憑藉「文化正統論」，塑造蒙元統治正當性的努力。他們知道，唯有如此才能在漢地文化傳統中確立蒙古統治的合法性。所謂「昔為儒教大宗師，今作中原聖天子」，²⁰⁴ 一旦宣示接續了儒家的傳統，統治漢地便是順理成章之事。

面對這種「文化正統論」，〈論中原檄〉也從同樣的角度，援據元朝「廢長立幼」、兄弟內亂等諸多事例，攻擊元廷「廢壞綱常」、「瀆亂」人倫，以此塑造一個作為中國文化他者、「非我族類」的蒙元。而這種批評角度，並非是明初的發明，

²⁰⁰ 郝經，《郝文忠公陵川文集》（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91冊，據明刊本影印），卷三七，〈與宋國兩淮制置使書〉，頁819上。郝氏這一觀念及其影響，參看李治安，〈元初華夷正統觀念的演進與漢族文人仕蒙〉，《學術月刊》2007.4：134-139。

²⁰¹ 這類論述，在元代人創作的大量修學記中體現得最為明顯。然而，儒學在元代並非國家意識形態，蒙元政府並不特別重視儒學，儒學教育亦不發達。元人揭傒斯坦稱，「自我元有天下、君中國，凡所與共治者，皆群方萬國之人，知佛而不知孔氏者十八九」，這才是元代的真實狀況。見揭傒斯著，李夢生標校，《揭傒斯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三教堂記〉，頁513。元代儒學教育的相關個案研究，可以參看蔡春娟，〈元代大都路儒學教育〉，《中國史研究》2015.3：155-167。

²⁰² 見《元史》卷一六三，頁3825。當然，諸儒這一舉動，還有蠲免賦役等現實利益的考量。

²⁰³ 歐陽玄，《圭齋文集》卷九，〈許文正公神道碑〉，頁6a。

²⁰⁴ 任氏，〈辨正孔洎表〉，陳鏞，《闕里誌》（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76冊，據明崇禎刻、清雍正增修本影印），卷一二，頁464上。

至少我們在前文所引的元人〈學前潘氏族譜序〉中即已看到。此前至正二十三年(1363)，夏主明玉珍在即位詔書裡，亦云「元以北狄污我中夏，倫理以之晦冥，人物為之銷滅」，²⁰⁵ 和〈論中原檄〉一樣，採用的一樣是血統加文化的雙重論證。

檄文所謂「自古帝王臨馭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反映的是宋人根據《春秋》改造的「內夏外夷」論。所謂《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²⁰⁶ 本來是指《春秋》的敘事立場，即當敘述夷夏交涉時，《春秋》站在「夏」的立場上。而在宋代強鄰並立的環境下，「內夏外夷」逐漸演變為夷夏各有「定分」（即各有天賦的地理場所與文化性情）、不可相互干涉的理論。因此不僅「裔夷謀夏」不可接受，像漢武帝、唐太宗那樣主動對外征服，也不可取。²⁰⁷ 這一觀念在元代依然有影響，元末胡翰(1307-1381)曾作〈正紀〉，文中所謂的正「地紀」，就是強調華夷之間不應當逾越天設的地理界限：

何謂地紀？中國之與夷狄，內外之辨也。以中國治中國，以夷狄治夷狄，勢至順也。……（前論南北兩紀，即「中國」與北胡、南越的兩條地理邊界；兩紀之外）四夷居之，風氣不同、習俗亦異……雖有聖人，不能使之同仁，從其族類可也。²⁰⁸

綜括胡氏之意，也即華夷各有天造地設的地理區域，不能相互侵擾、強而合一。這完全繼承了宋人的觀念。因為華夷異秉，聖人也不能強迫四夷「使之同仁」；對待外夷的態度，應如蘇軾所言，當「以不治治之」。²⁰⁹ 正是依據宋人重新闡釋的「內夏外夷」論，〈論中原檄〉才會有「中國居內」、「夷狄居外」的地理分野，才會

²⁰⁵ 楊學可，《明氏實錄》，頁7下。「北狄」原作「北人」，據錢謙益《國初群雄事略》引《明氏實錄》改，見氏著，《國初群雄事略》（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118。

²⁰⁶ 見《春秋公羊傳注疏》（收入阮元，《十三經注疏》），卷一八（成公十五年），頁2297上。

²⁰⁷ 例如宋元之際的戴表元觀看〈唐西域圖〉，感慨中國不可兼治「荒服」，「西漢以來，夸君倖將，貪空名而釀酷禍，以至於唐人之事如此，蓋可悲而不可慕也」。見戴表元，《剡源文鈔》（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107冊，據《適園叢書》本影印），卷一，〈唐西域圖記〉，頁760下。按，上述引文，《四部叢刊》本《剡源戴先生文集》刪略。下文所引胡翰〈正紀〉，對唐的擴張也有強烈批評。

²⁰⁸ 胡翰，《胡仲子集》卷一，〈正紀〉，頁3。按，此文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胡仲子集》中被刪去（《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29冊）。從文中「由晉之後，汨地之紀者，莫劉淵若也」一句看，作者尚不敢以元滅宋為例，寫作時間當在元代。

²⁰⁹ 蘇軾，《經進東坡文集事略》（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第158冊，據宋本影印），卷一〇，〈王者不治夷狄論〉。蘇氏此論在宋代獲得廣泛認同，影響極大。這種理論可以追溯到《公羊春秋》何休注，所謂「王者不治夷狄，錄戎者，來者勿拒，去者勿追」。見《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二（隱公二年），頁2202中。

有「驅逐」而非征服或者消滅「胡虜」的提法。在元末群雄當中，「驅逐胡虜」的口號也不是朱元璋獨創，徐壽輝和明玉珍都有「期逐元虜，以靖中夏」、「驅逐元虜，以為生民主」的說法，²¹⁰ 這些口號都有共同的思想淵源。

〈論中原檄〉夷夏理論的另一個要點，是天運循環的歷史觀。這包含兩方面內容。檄文首先承認，元人入主、四海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也即元之吞金滅宋，乃天意使然。這也是元代許多人的共識，因為除去「天意」，實在無法解釋元人何以能建立如此空前龐大的帝國；²¹¹ 即便反元的明玉珍，也得承認元朝斷絕「夏商周、漢唐宋」之政統，「咸云天數，敢謂人謀」。²¹² 然而，檄文隨即論證元朝已因不遵禮法而致天命轉移，並拋出「胡虜無百年之運」的運數論，從此推導出元之必亡。方震華教授已經指出，「夷狄無百年之運」的運數論，基於金亡的歷史經驗而形成於南宋後期的士人當中，並以史論的形式，在元代編纂的史書當中繼續流傳，〈論中原檄〉的提法淵源有自。²¹³ 此處想要稍作補充的是，這種運數論曾在元末引起廣泛共鳴，受到各支反元勢力的重視，不獨朱元璋部。方國珍起事時，就有人以「夷狄無百年之運，元數將盡」進行鼓動；²¹⁴ 徐壽輝的幕僚劉夏，亦謂正因「夷狄之運將滿百年」，才有了元末的大亂。²¹⁵

回顧上文的梳理可以發現，〈論中原檄〉中的夷夏觀，並非是明初人孤明獨發，而是背後有一條自宋末以來一直延續的潛在思想史脈絡。梁啟超曾經將清末民初思想變遷的推動力，歸納為「殘明遺獻思想之復活」；²¹⁶ 類似的，元末群雄起事時的高調夷夏宣傳，也可以看作是在元代不絕如縷的宋季夷夏觀念的舊調重彈。在元代，它長期以來都只是一股思想伏流，元末才如黃河出於積石一般，奔湧而出。放在元末的語境當中，〈論中原檄〉中的觀念既不新穎、也不突兀，只是對元季眾聲的一種匯集。

²¹⁰ 楊學可，《明氏實錄》，頁5下,9上。

²¹¹ 例如，元人解釋聖旨的發端語「長生天氣力裡」，即謂「欽惟聖朝，荷天地之洪禧，奄有萬邦，薄海內外，悉皆臣屬，故曰『長生天氣力裡』」，將元代「歷古所無」的空前一統與天意連接起來。見徐元瑞撰，楊訥點校，《史學指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頁37。揭傒斯謂元之滅宋，乃是「天方以數千年不能大混一之天下付之世祖皇帝」的必然結果，並非由於南宋啟釁拒和。見揭傒斯，《揭傒斯全集》，〈題昔刺使宋圖後〉，頁470。

²¹² 楊學可，《明氏實錄》，頁7下。

²¹³ 見方震華，〈夷狄無百年之運〉，頁159-191。

²¹⁴ 宋濂，《宋濂全集》卷五三，〈故資善大夫廣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方公神道碑銘〉，頁1256。

²¹⁵ 以上引文均見劉夏，《劉尚賓文續集》卷三，〈戊戌五月擬上劉晉昭參議書〉，頁136上。

²¹⁶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頁28。

六·結論：作為元代思想潛流的夷夏觀念

從宋末到元末，本文考察了夷夏觀念的顯隱變化歷程。這裡需要強調的是，在盛元時代，漢族人中的族群意識與夷夏觀念，只是一種思想潛流。首先，迫於環境壓力，這些觀念在當時無法公開、直白地表達，即便形諸文字，它們也大多只能像前文討論的那樣，借助各類典故與隱喻，委曲地暗示出來。其次，與宋季不同，元代具備族群觀念自覺的士人是少數，並非士人的主體。元代長期的族群接觸，是造成這一思想差異的根本原因。元末的劉夏，對此有一番概括性的論述：

近世以來七八十年，華夷同風，天下無復有內外之辨……當其（按，宋元）革命之初，父兄者老相與疑怪，以為異類。歲月既久，漸及百年，後生子弟，耳濡目染，精神心術與之俱化。²¹⁷

與指斥元朝為「夷狄」相反，歌頌元朝亙古未有的「大一統」，才是士人的主流論調。²¹⁸ 這種現象直到明初開國之時，似乎都沒有根本性的改變。其時方孝孺曾作〈正統論〉、〈後正統論〉，譏刺以「夷狄」王朝為正統的史學觀點，但有人不以為然。方孝孺也將此歸因於元時的「歲熏月染」，以致很多人認為「昔既為其民矣，而斥之為夷狄，豈不駭俗而驚世哉？」²¹⁹ 劉夏和方孝孺的觀察，側面揭示了有元一代士人主流的思想狀況。

作為抵禦外侮的文化工具，夷夏論調在宋金季年曾經盛極一時，是當時士人主流的對外話語，見於當時的詩詞歌賦、政令文告、試題講義等多類文獻。進入元代之後，在政治與文化壓力下，前代遺民的話語受到極大抑制，公開語境下夷夏論述寥若晨星，夷夏論調迅速在文獻當中退潮。這一時期反映士人華夷觀念的典型文獻鄭思肖《心史》，依靠隱秘的手段才得以倖存。然而元代漢人的族群意識並未消亡，它們既反映在堅持故國文化傳統、拒絕北俗習尚的諸多舉動上，也通過使用隱晦的修辭、假託特定的主題（如「思宋」、「詠雁」），在文字史料中如草蛇灰線一般，不絕如縷。元代漢人族群意識不能根本消解的原因，是蕭啟慶先生多次強調的元代征服體制。²²⁰ 在征服狀態下，不同的族群身分對應著高下不同的權力；而具有同

²¹⁷ 劉夏，《劉尚賓文續集》卷三，〈上魏提舉數戊戌五月擬作〉，頁136下。

²¹⁸ 參看張佳，〈變調：宋元明番族題畫詩中的族群與國家觀念變遷〉，《中華文史論叢》2020.3：267-299。

²¹⁹ 方孝孺，《遜志齋集》卷二，〈後正統論〉，頁58。

²²⁰ 參看蕭啟慶，〈內北國而外中國〉，氏著，《元朝史新論》，頁56-58。蕭啟慶將魏特夫 (Karl A. Wittfogel) 「征服王朝」理論引入蒙元族群關係研究，多次強調蒙元「少數統治」下自始

一文化傳統的南北漢人群體，是被統治與歧視的主要對象。政治與經濟上的被壓迫感，時時提示著他們元帝國內部族群身分的差異。在征服體制之下，無法徹底瓦解胡漢間的心理隔閡、實現真正的族群融合，這也決定了漢人的族群意識，不可能完全消亡。到元末蒙元政府權威失墜之時，民間蟄伏的夷夏觀念再度凸顯，並成為元明易代的重要思想基調。明初北伐的宣傳文告〈諭中原檄〉，便在這一思想脈絡與政治背景下應運而生，中國近世政治與文化史上的另一頁，也隨之揭開。

2019年5月20日初稿，9月17日二稿，2020年1月20日三稿

(本文於民國一〇八年九月二十四日收稿；一〇九年二月二十日通過刊登)

後記

本文曾在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中國思想文化史工作坊」(2019年5月25日)宣讀，得與會師友指正，又承蒙本刊兩位審查人賜以周詳的審讀意見，謹此一併致謝！惟文中疏漏之處，概由作者自負。

至終存在的「征服狀態」，是族群融合最大的障礙。他指出，在元代族群等級制度下，不僅被壓迫者漢族的族群意識無法消泯，那些在文化上主動接受儒家文明而「士人化」的蒙古、色目知識分子，也不會放棄原有的族群認同。參看蕭啟慶，〈論元代蒙古色目人的漢化與士人化〉，氏著，《元代的族群文化與科舉》(臺北：聯經，2008)，頁55-84；蕭啟慶，〈千山獨行：我的習史歷程〉，氏著，《內北國而外中國：蒙元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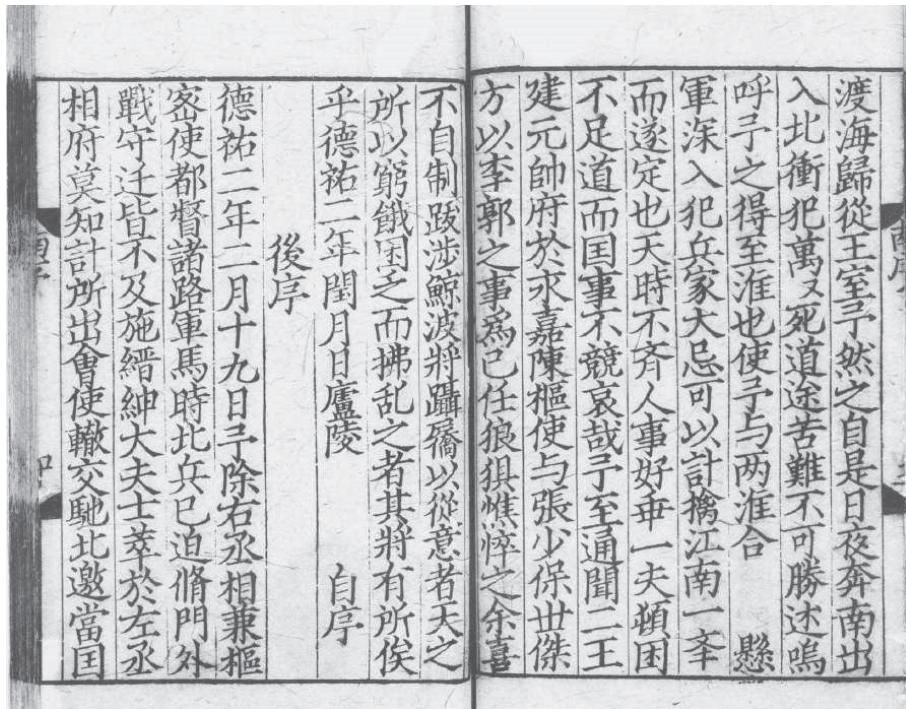
附錄一：本文引據史料版本異文舉例

篇名	本文引據本	別本
陳郁《藏一話腴》「甲午歲端平元年」條	民國《適園叢書》本《藏一話腴》： 本條有	清《豫章叢書》本《藏一話腴》： 本條無
潘音〈待清軒〉〈社日〉〈遠遊〉〈感詠〉	《宋籍珍本叢刊》影印清抄本《待清軒遺稿》： 以上諸詩有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兩宋名賢小集·待清軒遺稿》： 以上諸詩無
胡翰〈正紀〉	《金華叢書》本《胡仲子集》： 本篇有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胡仲子集》： 本篇無
葉顥〈予夜宿山村……賦一絕紀事云〉〈秋日懷童冀……賦一絕美之〉	《續金華叢書》本《樵雲獨唱詩集》： 以上兩詩有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樵雲獨唱》： 以上兩詩無
陸秀夫〈授文天祥通議大夫右丞相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詔〉	四部叢刊影萬曆本《文山先生全集》： 適 <u>裔虜之猾夏</u> ，率義旅以勤王	清五柳堂刊本《宋左丞相陸公全書》： 適 <u>北兵之奄及</u> ，率義旅以勤王
謝枋得〈與李養吾書〉	《四部叢刊續編》景明刊本《疊山集》： <u>夷狄不可為諸夏之王(主)</u> ，古今未有絕 <u>正統</u> 之時	嘉慶刊本《重刻謝文節公文集》： <u>聖神乃可為天下之主</u> ，古今未有絕 <u>道統</u> 之時

篇名	本文引據本	別本
崔禧〈大金故應奉翰林文字贈濟州刺史李公碑銘並序〉	王昶《金石萃編》： 我進士第一人，重有祿位， <u>汝何禽畜</u> ，吾豈為汝使哉！	張金吾《金文最》： 我進士第一人，重有祿位， <u>汝何禽畜吾</u> ，吾豈為汝使哉！
武曦〈乾州刺史抹撚公德政碑〉	崇禎《乾州志》： 公以 <u>虜寇</u> 不大治，則雖去而恐復至	張金吾《金文最》： 公以 <u>敵寇</u> 不大治，則雖去而恐復至
潘音〈待清軒〉	清抄本《待清軒遺稿》： 衣冠歸 <u>左衽</u> ，海國陷黃塵 …… 何時啟昌運， <u>中國</u> 產聖人	顧嗣立輯《元詩選》初集： 衣冠歸□□，海國陷黃塵 …… 何時啟昌運，□□產聖人
王冕〈南城懷古〉	《邵武徐氏叢書》本《竹齋詩集》： <u>契丹</u> 踪跡埋荒草， <u>女直</u> 煙花隔短牆 …… 書生慷慨何多恨， <u>恨殺</u> 當年石敬瑭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竹齋詩集》： <u>銅駝</u> 踪跡埋荒草， <u>元菟</u> 風塵識戰場 …… 書生慷慨何多感， <u>轉憶</u> 輪台漢武皇
王冕〈感懷〉	《邵武徐氏叢書》本《竹齋詩集》： 南國 <u>漸知</u> 新禮樂，中原誰問古衣冠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竹齋詩集》： 南國 <u>山川</u> 頻入夢，中原戎馬獨憑欄

附錄二：元刊史書忌諱闕文舉例

1. 《新刊指南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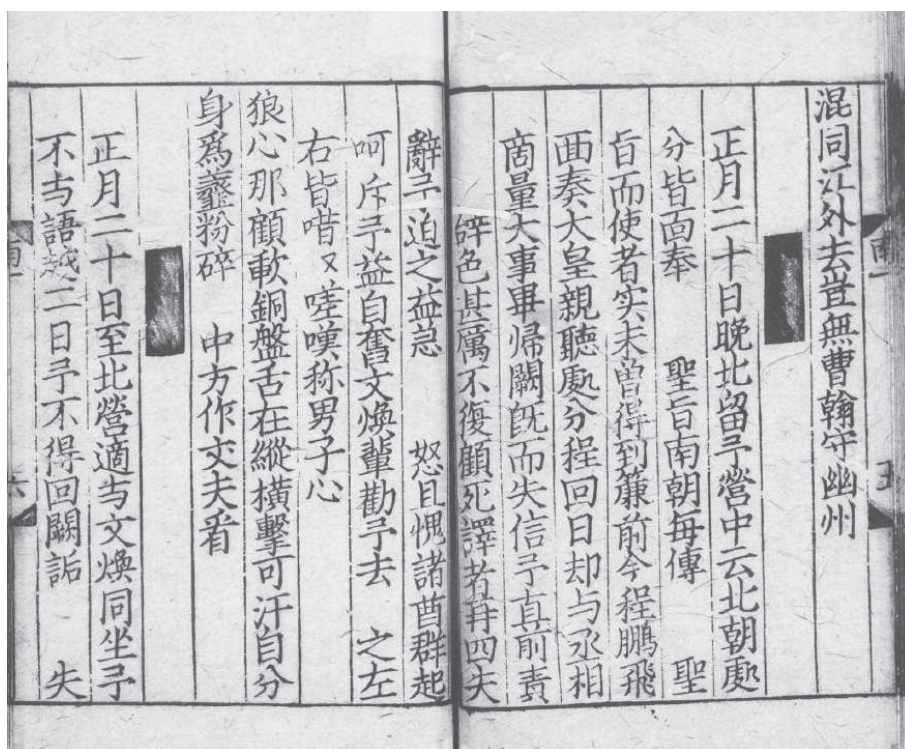


圖一：〈新刊指南錄序〉

(圖像來源：靜嘉堂文庫)

闕文舉例 (據《四部叢刊》影明刊本《文山先生全集》補闕)

1. 使予與兩淮合，□□[北虜]懸軍深入，犯兵家大忌，可以計擒
2. 德祐二年閏月日，廬陵□□□[文天祥]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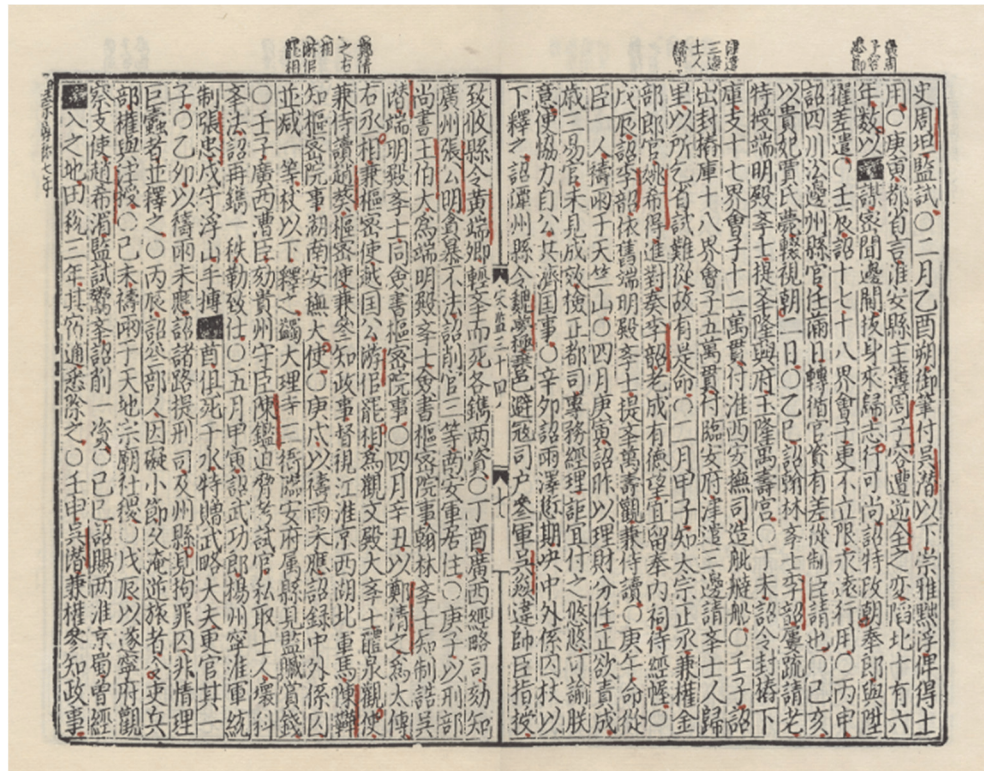
圖二

(圖像來源：靜嘉堂文庫)

闕文舉例（據《四部叢刊》影明刊本《文山先生全集》補闕）

1. 予直前責□□[虜酋]，辭色甚厲
2. □□[大酋]怒且愧
3. □[虜]之左右，皆喑喑嗟嘆，稱男子心
4. 自分身為齏粉碎，□[虜]中方作丈夫看
5. 予不得回闕，話□□[虜酋]失……

3. 元刊本《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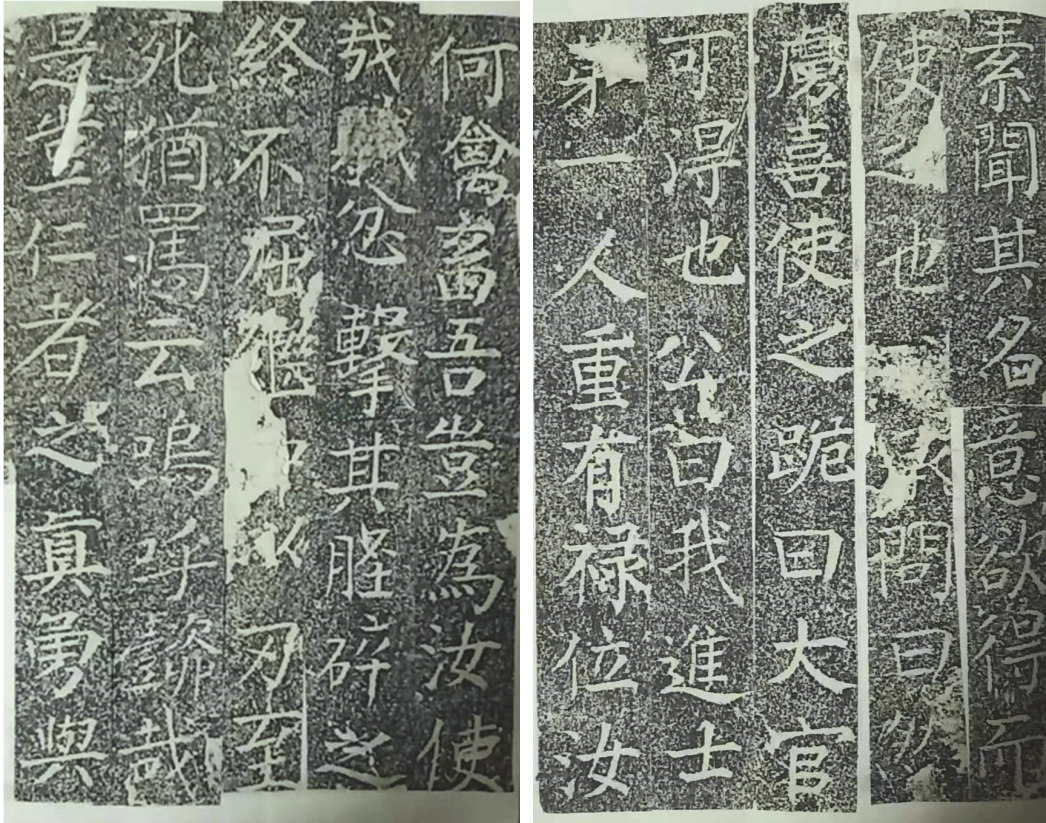


圖五：《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元刊本《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圖像來源：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中華再造善本」數據庫）

1. 元刊本《宋史全文》： 陷北十有六年，數以■謀密聞邊閫。
 文淵閣四庫本《宋史全文》： 陷北十有六年，數以外謀密聞邊閫。
2. 元刊本《宋史全文》： 戍守浮山，手搏■首，俱死于水。
 萬曆本《續文獻通考》： 戍守浮山，手搏虜首，俱死于水。
3. 元刊本《宋史全文》： 詔賜兩淮京蜀曾經■入之地田稅三年。
 萬曆本《續文獻通考》： 詔賜兩淮京蜀曾經虜入之地田稅三年。

張佳

附錄三：〈大金故應奉翰林文字贈濟州刺史李公碑銘並序〉拓片（局部）



（圖像來源：「孔夫子舊書網」拍賣品）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
- 《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
- 《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 《春秋公羊傳注疏》，收入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
- 《春秋左傳正義》，收入阮元，《十三經注疏》。
- 《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 《至正金陵新志》，收入《宋元方志叢刊》第6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影印。
- 弘治《無錫縣志》，收入《南京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第46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2。
- 崇禎《乾州志》，收入《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匯刊》第15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
- 孔元措，《孔氏祖庭廣記》，收入《四部叢刊續編》第14冊，上海：上海書店，1984，據蒙古刊本影印。
- 孔克齊，《靜齋至正直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16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清抄本影印。
- 文天祥，《文山先生文集》，明景泰刊本，北京：國家圖書館藏。
- 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第217-218冊，上海：上海書店，1989，據明萬曆刊本影印。
- 方回，《桐江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32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宛委別藏清抄本影印。
- 方孝孺撰，徐光大點校，《遜志齋集》，寧波：寧波出版社，2000。
- 方鳳，《存雅堂遺稿》，收入《存雅堂遺稿集成》第6冊，北京：學苑出版社，2015，據《續金華叢書》本影印。
- 王昶，《金石萃編》，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886-89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清嘉慶刊本影印。
- 王冕，《竹齋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3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王冕，《竹齋詩集》，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110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4，據《邵武徐氏叢書》本影印。
- 王冕著，壽勤澤點校，《王冕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張佳

- 王賓，《光庵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28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據清抄本影印。
- 王禕，《王忠文公文集》，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 98 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版權頁無出版年，據明刊本影印。
- 王應麟，《四明文獻集》，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 106 冊，據《四明叢書》本影印。
- 王繼宗校注，《《永樂大典·常州府》清抄本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6。
- 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
- 朱德潤，《存復齋續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324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涵芬樓秘笈》本影印。
- 何中，《知非堂稿》，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 94 冊，據清抄本影印。
- 吳榮光，《辛丑銷夏記》，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2。
- 吳澄，《吳文正公集》，收入《元人文集珍本叢刊》第 3-4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據明成化刊本影印。
- 宋濂著，黃靈庚點校，《宋濂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
- 李俊民，《莊靖先生遺集》，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 107 冊，據《山右叢書初編》本影印。
- 李俊民，《莊靖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90 冊。
- 李俊民著，魏崇武等點校，《李俊民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
- 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鳳凰出版社，1997-2004。
- 李道謙，《甘水仙源錄》，收入《正統道藏》第 19 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 汪元量，《湖山類稿》，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 107 冊，據《武林往哲遺著》本影印。
- 汪炎昶，《古逸民先生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32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清抄本影印。
- 汪聖鐸點校，《宋史全文》，北京：中華書局，2016。
- 貝瓊，《清江貝先生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第 250 冊，據明初刊本影印。
- 周密，《癸辛雜識》，北京：中華書局，1988。
- 林景熙撰，陳增傑補注，《林景熙集補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 俞本撰，李新峰箋證，《紀事錄箋證》，北京：中華書局，2015。
- 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鑑》，元刊初印本，上海：上海圖書館藏。
- 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鑑》，清胡克家覆元刊本，北京：國家圖書館藏。
- 胡聘之，《山右石刻叢編》，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907-90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清光緒刊本影印。
- 胡翰，《胡仲子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29 冊。

- 胡翰，《胡仲子集》，收入《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據《金華叢書》本排印。
- 徐元瑞撰，楊訥點校，《吏學指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 徐勉之，《保越錄》，收入《叢書集成初編》，據十萬卷樓叢書本排印。
- 郝經，《郝文忠公陵川文集》，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91冊，據明刊本影印。
- 崔滋，《補閒集》，收入蔡鎮楚編，《域外詩話珍本叢書》第8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
- 區仕衡，《九峰先生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32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清刻本影印。
- 張孟兼，《白石山房逸稿》，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6冊，據清刊本影印。
- 張金吾，《金文最》，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65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清光緒江蘇書局刻本影印。
- 曹志，《拱和詩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4冊，據清抄本影印。
- 畢沅，《山左金石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91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清嘉慶刊本影印。
- 許月卿，《先天集》，收入《四部叢刊續編》第70冊，據明嘉靖刊本影印。
- 陳立，《白虎通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94。
- 陳郁，《藏一話腴》，收入《叢書集成新編》第87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據《適園叢書》本影印。
- 陳郁，《藏一話腴》，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88冊，據《豫章叢書》本影印。
- 陳高華等點校，《元典章》，北京：中華書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
- 陳桎，《續資治通鑑》，收入《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第5輯史部第17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據元刊本影印。
- 陳鎬，《闕里誌》，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76冊，據明崇禎刻、清雍正增修本影印。
- 陳鎬，《闕里誌》，收入《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第407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據明正德元年刻增修本影印。
- 陶安，《陶學士先生文集》，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97冊，據明刊本影印。
- 陸心源，《儀顧堂續跋》，收入馮惠民整理，《儀顧堂書目題跋彙編》，北京：中華書局，2009。
- 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北京：中華書局，2009。
- 揭傒斯著，李夢生標校，《揭傒斯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張佳

- 曾棗莊主編，《全宋文》，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
- 焦竑，《國朝獻徵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525-53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明萬曆刊本影印。
- 程敏政輯，《宋遺民錄》，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88 冊，據明嘉靖刊本影印。
- 程鉅夫，《楚國文憲公雪樓程先生文集》，收入《元史研究資料彙編》第 26-27 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據清宣統二年（1910）陶氏涉園影明洪武刊本影印。
- 黃宗羲，《西台慟哭記註》，收入吳光編，《黃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第 2 冊。
- 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第 239-240 冊，據元刊本影印。
- 黃瑞輯，《台州金石錄》，《嘉業堂叢書》本，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藏。
- 楊瑀，《山居新語》，北京：中華書局，2006。
- 楊學可，《明氏實錄》，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159 冊，據《學海類編》本影印。
- 楊鐮主編，《全元詩》，北京：中華書局，2013。
- 葉子奇，《草木子》，北京：中華書局，1959。
- 葉兌，《四梅軒集》，收入《明別集叢刊》第 1 輯第 4 冊，黃山：黃山書社，2013，據一九四八年包賚抄校本影印。
- 葉顥，《樵雲獨唱》，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19 冊。
- 葉顥，《樵雲獨唱詩集》，《續金華叢書》本，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藏。
- 虞集，《道園學古錄》，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第 235-236 冊，據明景泰刊本影印。
- 蔣正子，《山房隨筆》，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 156 冊，據《藕香拾零》本影印。
- 熊太古，《冀越集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16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清抄本影印。
- 熊飛等，《謝疊山全集校註》，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
- 趙秉文，《閒閒老人滄水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第 219 冊，據汲古閣鈔本影印。
- 劉夏，《劉尚賓文續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32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明刊本影印。
- 劉秩，《聽雪篷先生詩集》，收入《明代詩文集珍本叢刊》第 6 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9。
- 歐陽玄，《圭齋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第 242 冊，據明成化刊本影印。
- 歐陽起鳴，《歐陽論範》，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23 冊，據明刊本影印。
- 潘音，《兩宋名賢小集·待清軒遺稿》，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64 冊。

- 潘音，《待清軒遺稿》，收入《宋集珍本叢刊》第 88 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據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影印。
- 鄭元祐，《僑吳集》，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 95 冊，據明弘治刊本影印。
- 鄭思肖著，陳福康校點，《鄭思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 蕭立之，《蕭冰崖詩集拾遺》，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32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明弘治刻本影印。
- 錢大昕撰，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16，增訂本。
- 錢謙益，《國初群雄事略》，北京：中華書局，1982。
- 戴表元，《剡源文鈔》，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 107 冊，據《適園叢書》本影印。
- 戴表元，《剡源戴先生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第 228 冊，據明萬曆刊本影印。
- 謝枋得，《疊山集》，收入《四部叢刊續編》第 70 冊，據明刊本影印。
- 謝鐸輯，《赤城論諫錄》，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69 冊。
- 韓愈撰，劉真倫校注，《韓愈文集彙校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17。
- 瞿佑，《歸田詩話》，收入喬光輝點校，《瞿佑全集校註》，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 蘇天爵撰，陳高華點校，《滋溪文稿》，北京：中華書局，1997。
- 蘇軾，《經進東坡文集事略》，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第 158-159 冊，據宋本影印。
- 顧炎武撰，黃汝成集釋，樂保群點校，《日知錄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顧嗣立輯，《元詩選》初集，北京：中華書局，1987。
- 權衡，《庚申外史》，收入《叢書集成初編》，據《學津討原》本排印。

二·近人論著

方震華

- 2017 〈夷狄無百年之運——運數論與夷夏觀的分析〉，《臺大歷史學報》60：159-191。

毛海明

- 2016 〈桑哥輔政碑事件探微——以翰林官僚張之翰的仕宦轉折為線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7.3：611-668。

王汎森

- 2015 《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張佳

王崇武

- 2010 〈明太祖與紅巾〉，周保明、吳平選編，《東方雜誌·學術編》，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第7冊，頁4341-4345。

朱鴻林

- 2006 〈劉基《春秋明經》的年代問題〉，《浙江工貿職業技術學院學報》6.4：4-12。

牟潤孫

- 1987 《注史齋叢稿》，北京：中華書局。

吳晗

- 1986 〈元帝國之崩潰與明之建國〉，北京市歷史學會主編，《吳晗史學論著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卷，頁81-138。

李治安

- 2007 〈元初華夷正統觀念的演進與漢族文人仕蒙〉，《學術月刊》2007.4：134-139。

- 2009 〈兩個南北朝與中古以來的歷史發展線索〉，《文史哲》2009.6：5-19。

李博

- 2019 〈《孔氏祖庭廣記》的編纂特色與史學價值〉，《濟寧學院學報》40.4：58-63。

近藤一成撰，尤東進譯

- 2018 〈文天祥的「自述」與「他述」——以文天祥全集的編纂為中心〉，《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10：49-60。

姚大力

- 2011 〈元朝科舉制度的行廢及其社會背景〉，氏著，《蒙元制度與政治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219-278。

- 2018 〈面對故國的忠誠〉，氏著，《追尋「我們」的根源——中國歷史上的民族與國家意識》，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頁319-326。

洪麗珠

- 2005 〈元代鎮江路官員族群分析——江南統治文化的一個樣本〉，中國元史研究會編，李治安主編，《元史論叢》第10輯，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頁251-277。

胡春濤

- 2012 《老子八十一化圖研究》，成都：巴蜀書社。

韋兵

- 2013 〈完整的歷史經驗：天下的「夷狄之維」〉，《學術月刊》2013.6：153-158。

- 孫克寬
1968 《元代漢文化之活動》，臺北：臺灣中華書局。
- 宮崎市定
2017 〈從洪武到永樂——明朝初期政權的性質〉，張學鋒等譯，《宮崎市定亞洲史論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下冊，頁 1061-1079。
- 馬戎
2003 〈試論「族群」意識〉，《西北民族研究》2003.3：5-17。
- 張佳
2013a 〈再敘彝倫：洪武時期的婚喪禮俗改革〉，《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4.1：83-148。
2013b 〈元明之際「夷夏」論說舉隅：兼說清代官修書籍對明初史事的隱沒與改纂〉，《中國典籍與文化》2013.4：42-49。
2014 《新天下之化：明初禮俗改革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9 〈「深簷胡帽」：一種女真帽式盛衰變異背後的族群與文化變遷〉，《故宮博物院院刊》2019.1：21-39。
2020 〈變調：宋元明番族題畫詩中的族群與國家觀念變遷〉，《中華文史論叢》2020.3：267-299。
- 梁啟超
1926 〈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氏著，《梁任公近著·第一輯》，上海：商務印書館，下卷，頁 43-106。
2014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陳垣
2008 《元西域人華化考》，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2009a 《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收入陳智超主編，《陳垣全集》，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第 18 冊。
2009b 《通鑑胡注表微》，收入陳智超，《陳垣全集》第 21 冊。
- 陳高華
1991 〈元代稅糧制度初探〉，氏著，《元史研究論稿》，北京：中華書局，頁 1-20。
2005 〈元朝的土地登記和土地籍冊〉，氏著，《元史研究新論》，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頁 26-48。
- 陳得芝
1997 〈論宋元之際江南士人的思想和政治動向〉，《南京大學學報》1997.2：147-161。

張佳

陳福康

2001 《井中奇書考》，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

郭立暄

2020 〈元本《通鑑》胡注校餘述略〉，《文史》2020.3：157-186。

秦綦

2020 〈新見上圖藏元本胡注《資治通鑑》初讀記〉，《文匯報·文匯學人》2020.08.07。

陶晉生

2013 〈金代的中國知識分子〉，氏著，《宋遼金史論叢》，臺北：聯經，頁 455-478。

費孝通

1989 〈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北京大學學報》1989.4：1-19。

黃清連

1978 〈元初江南的叛亂(1276-1294)〉，《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9.1：37-76。

楊訥

2008 〈徐壽輝、陳友諒等事蹟發覆——劉尚賓文集讀後〉，《中華文史論叢》2008.2：71-94。

2012 〈罕見的元人文集《鰲溪周先生文集》與《雲山一懶翁集》〉，氏著，《元史論集》，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頁 426-430。

葛兆光

2004 〈宋代「中國」意識的凸顯——關於近世民族主義思想的一個遠源〉，《文史哲》2004.1：5-12。

2010 《中國思想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第2卷。

熊鳴琴

2014 《金人「中國」觀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熊燕軍

2018a 〈宋季忠義的歷史書寫研究——從袁桷《延祐四明志》未立袁鏞傳談起〉，《歷史人類學學刊》16.2：1-42。

2018b 〈鄧光薦史學著述雜考〉，《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35：53-60。

蒙思明

2006 《元代社會階級制度》，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趙永春

2009 〈試論金人的「中國觀」〉，《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9.4：1-12。

- 劉浦江
2014 〈元明革命的民族主義想象〉，《中國史研究》2014.3：79-100。
2017 《正統與華夷：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 劉海威
2018 〈讖謠所見之「達達」、「回回」和「漢兒」——《元典章》「亂言平民作歹」條解讀〉，姚大力、劉迎勝主編，《清華元史》第4輯，北京：商務印書館，頁42-62。
- 樊文禮
2011 《儒家民族思想研究：先秦至隋唐》，濟南：齊魯書社。
- 蔡春娟
2015 〈元代大都路儒學教育〉，《中國史研究》2015.3：155-167。
- 蔡美彪
2009 〈《元朝秘史》與《史集》中的趙官〉，《中國史研究》2009.4：101-104。
2012 〈元代文獻中的達達〉，氏著，《遼金元史考索》，北京：中華書局，頁207-214。
- 蕭啟慶
1999 《元朝史新論》，臺北：允晨文化。
2007 〈千山獨行：我的習史歷程〉，氏著，《內北國而外中國：蒙元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頁1-17。
2008 〈論元代蒙古色目人的漢化與土人化〉，氏著，《元代的族群文化與科舉》，臺北：聯經，頁55-84。
2012a 《元代進士輯考》，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2012b 《九州四海風雅同：元代多族土人圈的形成與發展》，臺北：聯經。
- 錢雲
待刊 〈陰陽與華夷：宋代中國對外關係理論的嬗變與展開〉。
- 錢穆
2009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第6冊。
- 羅瑛
2016 〈族群相關概念及理論維度綜述〉，《西北民族大學學報》2016.5：34-39。

張佳

The Undercurrent of Proto-Nationalism in the Yuan Dynasty

Jia Zhang

National Institute for Advanced Humanistic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The *Yu zhongyuan xi* (諭中原檄), issued by Zhu Yuanzhang during the transition between the Yuan and Ming, was significant in Chinese early modern history because of its radical proto-nationalism. But according to existing research, the Han group (漢人) in the Yuan dynasty lacked ethnic consciousness. The Yuan-Ming transition is even regarded as “an imaged ethnic revolution.” In this context, the *Yu zhongyuan xi* is without intellectual roots.

This essay investigates proto-nationalism in the Yuan dynasty. Although it did not dominate the Han elites, proto-nationalism persisted throughout the Yuan dynasty. Faced with pressure from northern nomads, both Southern Song and Jin utilized proto-nationalism within the Confucian order (such as in *hua yi zhi bian* 華夷之辨 and *yi xia zhi fang* 夷夏之防) as a mechanism of resistance, which deeply affected the elites. In the early Yuan, these nationalistic discourses almost completely disappeared in the historical record. This phenomenon should not be interpreted as a sudden intellectual conversion of the elites. On the contrary, it reflects the pressure of Mongolian rule. As a kind of intellectual undercurrent, proto-nationalism within the Yuan elites was reflected not only in writings, but also in behavior such as preserving the habit of wearing Han dress, rejecting nomadic customs and longing for the previous dynasty. Using different rhetoric, these nationalistic discourses were obscure, and could only be understood in special contexts. Not until the late Yuan did these discourses emerge again publicly and become a foundational concept of the Yuan-Ming transition. The *Yu zhongyuan xi* is a compilation of these ethnic expressions. It has two intellectual sources. One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Yi-xia* theory reinterpreted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the other is the undercurrent of ethnicity within the Han group in the Mongolian era.

Keywords: Yuan dynasty, proto-nationalism (*Yi-xia* theory), ethnicity, *Yu zhongyuan xi*